

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辑

前 言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底层群众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但在左派中，仍然存在构造“合理”的理念和理论体系的问题，缺乏对现实矛盾运动的分析。正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批判的：“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

总结改革开放史，需要拨开各种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迷雾。经过系统学习基础理论（学习过程和内容详见附录），从今年春节后，我们开始学习《资本论》和改革开放史。我们以《资本论》为指导，尝试研究现存生产关系及其运动变化过程，分析资本运动的条件和要求，以此为基础总结各种代表人物的言论和观点，研究现实的阶级矛盾，初步梳理 30 年的历史脉络。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反对以下几种唯心史观：

第一，反对诸如“80 年代好、90 年代不好”等观点。此类观点对历史进行人为的截取，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环静止化为理想状态，并予以美化和歌颂。例如有些老左派认为 80 年代最理想，贫富差距不大、群众精神面貌较好；90 年代以后很糟糕，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产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事实上，无论是信贷、商品流通、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条件，还是国企改革进程，无论是传统工人雇佣化还是建立新劳动力市场，80 年代都是 90 年代的胚胎，80 年代每个看似美妙的原因都酝酿着 90 年代以后的“恶果”（详见《资本的复兴》《复活生息资本》等文章）。

有些三农问题研究者鼓吹 80 年代是合理的，90 年代后的三农政策误入歧途，试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小农获得永生，在合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努力也会和民粹派的先辈得到同样的结

果。事实上，90年代农村的衰落无非是资本快速增殖的客观要求（详见《再造资本家阶级》等文章）。如果不剥夺农民，怎样能为资本提供大量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如果不剥夺农业，怎样能为世界工厂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原料；如果农村不衰落，现代大都市又如何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就金壁辉煌呢？

第二，反对“阴谋论”。很多人都认为由于某个人背叛，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倾覆。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近30年的历史也是如此，不过是资本自发力量起作用的结果。在原有社会基础里就存在资产阶级的土壤，个别人物的行为不过是表现其背后经济运动的要求（详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文章）。

还有很多人认为某个人手腕高明，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正如90年代农村衰落，80年代资本在农村首先复兴也是历史的必然。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力量最强的地方；而人民公社解体后，分田单干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商品交易的活跃这些剩余劳动力也成为了商品，为资本增值准备了前提，同时又继承了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所以乡镇企业才会“异军突起”。小生产“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反对关于社会性质的若干错误观点。关于社会性质的判断林林总总，例如“权贵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社会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必须观察分析当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雇佣劳动制。

以上观点均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包括研究资料里的文章，难免存在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辑部
2008年11月于北京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1851年9月

目 录

资本的复兴.....	1
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18
再造资本家阶级.....	32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46
社会主义与西藏问题.....	49
80 年代的群众运动.....	74
城市传统工人地位和作用.....	99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106
复活生息资本.....	114
附录：我们的学习方式.....	120

资本的复兴

官方这样评价 80 年代的改革过程^①：以包产到户为先锋，到 1983 年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普及；几乎与农村改革同时，四大经济特区于 1979 年设立，城市改革的探索迈开大步了；随着 1984 年国企改革由“放权让利”向“两权分离”的范式转换，中国的政经改革开始整体推进。而这必然引发资金、劳动力与其他各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层变革，生产与消费市场的逐步发育逼迫自上而下的计划之手节节退让，虽几经波折，但价格改革终于还是水到渠成，金融改革也得以市场化推进。“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型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发展增量为存量改革提供条件，成就了中国改革的渐进之名。

在政府的主导下，培养城乡资本，包括农村改革、外资经济增量改革，逐步扩大到城市，同原有工业争夺原料、产品市场。2001 年以来加入 WTO，标志着国内、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与此同时，国企工人合同化、大中专学生雇佣劳动化，雇佣劳动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一、农村成为试验场

建国后，以三大改造为标志，我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始终是薄弱的环节，容易被私有制占领。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农民具有

^① 回望改革三十年，世纪经济报道 2007 年 09 月 22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yjfx/20070922/14184004773.shtml>

双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个体农民的自发性，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集中表现。这与集中计划的公有制经济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①。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公社化，这一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其次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起农民并进行政治教育；最后加快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从经济基础上去掉农民的自发性。

尽管薄弱的农村成为突破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口气稍缓和，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处，也不要包产到户”；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场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上风，邓小平讲话时只能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甚至陈云、邓小平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②，万里接任农委主任后，在1980年9月

^① 1949-1950 高岗同刘少奇关于农村产生新富农、党员雇工问题的争论；1951 年山西省委同华北局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1955 年在合作化运动中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60 年代初批判“三自一包”。

^② 根据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1980 年春，陈云对万里鲜明的表达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态度：“完全赞成你在农村政策方面的做法”。邓小平一直没有公开表态，1980 年 4 月 2 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并强调指出：“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5 月 31 日邓小平公开表态（邓选 2 卷 315 页，《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农村改革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

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题座谈会上，对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多数与会者不主张允许包产到户，只有辽宁、内蒙、贵州少数几个表示支持，甚至有人表示：“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很难开下去，胡耀邦、万里等人主持，在最后印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1980年75号文件）中，只能写道：“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纪要》仅将包产到户作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农委主任万里很郁闷，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两年以后国家农委建制撤销。^①

围绕农村改革的争论，本质上也仍是一场政治斗争。一方坚持集体化路线，要求推进“学大寨”运动，认为走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在发展机械化的同时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升级至生产大队、公社。另一方主张尊重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自发性（即“积极性”），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主张承包的人没有掌权以前，不发文件、口头传达，先在贫困落后的云、贵、川等地试点，再说服领导争取合法性，对于来自另一派的批判坚决抵制。只有在1980年以赵紫阳取代陈永贵、以万里取代王任重以后^②，才为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分田运动创造了

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①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之三)，新长征(党建版)2006年06期

^② 1980年4月8日-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副总理。8月21日-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又任命万里兼任

条件。中央层面夺权后，马上在 1980 年 9 月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在贫困地区可以搞，为包产到户打开缺口；然后逐级传达，配合组织手段，以党的权威层层压下来。这些工作完成之后，1982 年 1 月，开始下发中央 1 号文件，为包干到户正式正名：“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改变。”此后发展迅速，到 1983 年 98% 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承包使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农村水利设施、农业机械中 70% 低价卖出，30% 废置丧失效益，土地零散化，对农村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小生产的蔓延，为以后“三农”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1978—1984 年的农村改革以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承包以后的传统种植业生产属于小生产，并且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主要的生产资料不能转移；同时土地容易被征用，个体生产的分散状态是大量征收土地费税的客观基础。尽管经过了 1982 年包干到户、1983—1984 年取消政社合一、1985 年取消统购统销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小生产具备了资本增殖的雏形，但仍然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转移，因此，农村的承包制只能作为恢复资本力量的先驱和示范，而不能成为资本运动的主体。改革派的元老杜润生这样总结：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帆船是农村改革”，农村为改革提供了风险较小的试验场所。

二、培养“增量”资本

在农村改革启动以后，小农逐步走向衰落，培养农村资本成为必然选择。首先，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村改革进入第二步，开始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去，搞多种经营，出现了一批

国家农委主任，接替了王任重的职务。8 月 30 日-9 月 10 日召开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陈永贵也被解除了副总理的职务。

种植、养殖、运输、建筑、加工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①

资本要增殖，必须靠榨取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198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75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并雇工的情况，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认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个人以下不算剥削。”^②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1983年1月，

^① 1984年，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8个省、市、区的272个村庄的37422个农户，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其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占其总数的3.5%。专业户的平均收入为7408元，相当于一般农户的6.1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一批平均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即“万元户”，占农户总数的0.56%。1984年同1983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23.6%，专业户增加51%，“万元户”增加62%。这些收入较多的农户雇工也多。家庭纯收入6000~9000元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3%，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50%；家庭纯收入9000元以上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1%，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40%。转引自曹兼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② 林子力认为，马克思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是对经典理论的明显歪曲和误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这一段文字，马克思主要说明要维持资本增殖运动，必须掌握最低限度的价值额，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为此马克思举例说，假如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必要劳动时间8小时、剩余劳动时间4小时，那么在资本家雇佣两个工人的时候，他才能过上跟工人同样的生活，并且只能维持生活，不能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为了使资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半转化为资本，这样他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增加为雇佣一个人时的8倍，同时至少需要雇佣8个人。马克思通过举例说明，不是任何规模的价值都可以成为资本的，如果价值太小、雇不起一定数量的工人，那么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马克思从来说过超过8个人才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说没有足够的价值额、雇佣不了一定数量的工人，即便占有他们的剩余价值也不能维持资本的增殖运动。

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问题被老左派看成是“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在当月中央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责“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材料内部登得很少。我们老祖宗马克思讲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万里于是表态：“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①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②胡耀邦也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1987年，在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了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1988年6月，

^① 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胡耀邦

^② 邓选三卷，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自然也合法化，获得了“准生证”。^①

随着雇佣劳动力的“解放”，“增量”资本获得了增殖的重要条件，逐步繁荣起来。1984年《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共中央[1984]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允许农民自办企业；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要积极地“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1986年国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1987年国家开始建立乡镇企业试验区……一系列的政策都直接改善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乡镇企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84年乡镇企业从上一年度的134万户猛增到606万户，职工总数从上一年度的3235万人猛增到5208万人；从1984—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从1710亿元增加到6496亿元，企业个数从606万增加到1888万，职工人数从5208万增加到9545万人。^②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一旦遇到合适的政策土壤，农村私有资本成长速度很快^③。同时，金融、商业政策的改革，在市场交换等方面也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

乡镇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对劳动力的容纳程度有限，80年代后期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县、市及沿海开发区转移，出现了“离土、离乡”的农民工。1987年8760万农民工当中就有2000万离土离乡。随着1988年开始治理经济环境，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开工不足、亏损

^① 徐庆全. 雇工是怎样获得“准生证”的. 炎黄春秋, 2007(2)

^② 姜春海.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回顾. 乡镇企业研究, 2002(2)

^③ 在84—88年这一阶段上，乡镇企业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多种多样，私有成分发展迅速。从企业数量来看，1984年集体企业占30.72%，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69.28%；到1988年，集体企业只占8.42%，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91.58%。从职工人数来看，1984年集体企业占76.46%，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23.54%；到1988年，集体企业职工占51.27%，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48.73%。从经济总量上，1984年乡镇集体企业总产值占全部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5.73%，到1988年占67.54%。

上升、企业职工人数下降，同时沿海地区却一支独秀，于是涌向沿海的民工潮出现。80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同国有企业争夺资本、原材料、资源，为解决这一矛盾，开始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利用沿海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同时给予优惠税收，吸引台资、港资华侨进入，两头在外，搞来料加工。这样，外资在沿海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

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扩张。到1998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2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1996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1.3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8%。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沿海外资的发展，“发展增量为存量改革提供条件”，逐渐形成了对城市工业的合围之势。

三、城市资本培育

在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为了沟通城乡贸易，城市私营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在87年以前，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不承认资本家的存在，官方理论不允许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剥削产生，但对现实产生的私营经济也没有明令禁止，也即抱“看一看”的态度。事实上早在1980年广东就出现了雇工超8人的私营业主，而1984年异军兴起的乡镇企业中，80%也是私营。1987年10月召开十三大，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尽管“一定程度的发展”措辞谨慎，但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而且明确提出保护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随后十三大精神写入宪法，在1988年4月12日人大《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15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配套的税收法规。这样就正式承认了

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从“地下”走到地上。

从1984年开始，城市里还出现了一批与传统不同的“公有制”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官办背景，以利润生产为目标，有的是挂靠国营、集体企业的服务企业，有的直接以个体、私营的形式出现。包括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各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工会妇联成立的、省市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设立的、军队设立的批发公司、商业企业等。初始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第一桶金，在价格闯关中发挥巨大力量。即老百姓痛恨的“官倒”，可以视为官僚资本。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这一年年底，全国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上海市统计，1984年由上海市各类党政机关团体兴办的企业达361家，官商公司122家，650多名党政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70%的这类公司从事着流通领域的经营，很明显，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88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直到1988年10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小“官倒”，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才开始有所收敛。

在农村改革的示范作用下，国有、集体企业也开始了承包租赁制改革。在解放资本力量同时，紧密配合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使国有、集体企业工人逐渐变成同农民工一样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商品。这一改革受到了企业干部、职工的强烈抵制，甚至直到前两年，新闻媒体还在谈论国有企业的“攻坚战”。

随着改革派掌握党、政、军大权，1982年修订《宪法》，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要求工人从入厂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

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改善。同时开始收缴厂矿企业民兵武装，正如恩格斯所说，“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①。从1980年起，缩小了组建民兵的范围，原来人民公社、厂矿、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单位都要组建民兵，现在改为只在人民公社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组建。1981年，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武器管理防止枪支弹药被盗的通知》精神，改进管理方式，以公社、厂矿为单位，将武器集中到基层武装部保管。到1982年底，全国民兵总数保持在1亿左右，比原来减少了60%。1985年，除执勤、训练武器由基层单位保管外，其余大部逐步集中到地区和县、市两级仓库封存保管。

从1984年开始，展开了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为顺利推进承包责任制改革提供组织保障，开始进行以“四化”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建国后培养了一批南下干部，相当一部分都在国营企业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批干部年龄较大、学历较低，一般都是随军培养的，仅有高小文凭。这部分老干部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熟悉鞍钢宪法的管理方式，多数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他们成为一长制的障碍。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以“三化”为实质的干部队伍改革目标：“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其次，这并不是说，不具备这三个条件或不合其中某一两个条件的德才兼备、善于学习、身体也好的同志就要调离。”^②1982年中央成立顾问委员会，陈云等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进入中顾委。1984年，国营企业开始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逐步将原有企业干部调离岗位，大批南下干部转为企业“顾问”，称为调研员，保留相应的薪职待遇；同时新的一批“敢闯敢干”、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重要

^① 马恩选集3卷，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

^② 邓选2卷，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领导岗位。以武汉市为例，1984 年调整了 50 户企业的领导班子，50 名新上任的厂长平均年龄 36.8 岁，比原来降低了 10.95 岁；50 人中 25 人有大专文化水平，比原来增加了 108%；28 人有专业技术职称，比原来增加了 86.6%。^①到 1985 年，全市企业中 64% 已经进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市共启用 4600 多名年纪轻、文凭高、适应承包制改革的干部。

与承包制相配套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就是厂长负责制。建国后，随着一五计划执行，照搬苏联的做法，在一些国营企业、交通企业中先后推行“一长制”，厂长独断专行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1956 年在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责问：“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毛认为苏联有些东西不能学，一个工厂几千人，“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②1961 年，毛泽东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工业七十条》），认为“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是企业管理的根本制度，并进一步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③写入条例，作为“鞍钢宪法”实施的具体形式。文革后期开始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80 年邓小平指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④，打开了这个问题的思想禁区。随后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以及社科院等部门通过试点，认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容易导致以党代政、不利于发挥厂长集中统一指挥的作用。1984 年 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的内容主要有：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

^① 李长海，肖克武。改革企业干部任免制度 走民主选拔厂长的新路。经济体制改革，1984（5）

^② 毛泽东传 1949-1976，第十三章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

^③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规定：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有权对企业的任何领导人员进行批评，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严重失职、作风严重恶劣的领导人员，并且有权越级控告。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0 页

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198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开，到当年年底在11402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8843家，占77.6%；在88000个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中，实行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和转让的达到40000个，占总数的46%。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正是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该法还规定“企业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可以采取承包、租赁等经营责任制形式。”通过赋予法律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承包责任制的发展，1988年年底已有90.8%的大中型企业实施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①

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承包者与所有者共同分割收入的一种形式。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在工厂中形成了“对工人的专制”^②，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承包制由于被认为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向国有企业领域推行，但承包制在农村和城市所实现的后果完全不同，因为国企的资本是可以转移、流动的。资本的自由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即追逐所谓“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法律中规定占有国企的剩余价值是非法的，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① 汪海波.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79-2000).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1

^② 资本论1卷，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4、工厂

四、改革计划用工制度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用工实行统包、统配的计划管理体制，企、事业招工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基本上是从学校毕业生中招收，由学校与劳动管理部门共同安置部分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不允许从社会上招工。70年代末知青大批返乡，多数待业，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近200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高峰。大城市就业压力更大，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待业。为了稳定城市、解决就业问题，197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1979-1980年，新就业的青年仍然主要流向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天津市在1979年集中搞了一次退休顶替工作，有15.8万职工退休，这种通过子女顶替的办法安置的就业人数占三年安置总数的29%。一些国营企业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还采取全民企业内办集体企业的办法，由国营工厂腾出一些厂房、设备兴办集体工厂、劳动服务公司。^①很多老工人认为，实行企业内部招工、顶替的办法对瓦解老工人对企业改革的抵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老工人认为自己是企业的创造者，是企业的主人，对物质刺激、一长制并不支持。但老工人的子女有很多是返乡知青或城镇闲散待业人员，实行子女顶替，首先孩子工作安排了，不再无所事事，其次自己退休后有退休金，不愁养老，如果技术好还可以返聘赚点闲钱。但当时的皆大欢喜却为以后的悲惨遭遇打下伏笔，尽管允许子女接班，但改革者把这些视为企业冗员，在90年代末的攻坚战里，一个企业垮掉，往往导致一家人同时下岗。

配合城乡资本的培育，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启动，核心是改变固定工制度，使工人身份向雇佣劳动力方向转变。1980年开始缩小统包统配的范围，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

^① 肖冬连，中国70年代末的就业危机与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契机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dyjrmgs/002025.html#_ftn2

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招工采取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原则。此后，用工体制逐渐向市场化、合同制转变。1984年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1986年废除子女顶替和内部招工办法。国营企业的合同工由1984年的174万人增加到1992年的2059万人，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从2%上升到18.9%。1993年实行企业用工自主权，企业在工资总额宏观调控下自行决定招工，不再到市劳动局审批招工计划。1995年公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1992年的2059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

90年代工人开始下岗，从1992到2002年，每年下岗人数由1992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万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万人，累计下岗7601万人（该数字应包括期间退休的工人）。^①

五、资本群体登台

通过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某些环节积聚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88年物价上涨，包括城乡私有企业、新型“公有制”公司在内的所有自由资本都大赚了一笔。在89风波中，新成长起来的私有资本集体亮相，试图问鼎政治，最终以私有资本代表四通公司老总万润南抛弃学生出逃海外为标志，私有资本从体制外争夺政治权力的道路被堵死。

当学生开始去游行时，有工人想参加，学生认为这是一场学生的民主运动，工人遭到排斥。到运动接近尾声注定失败时，学生又进厂寻求工人的援助。此时国企一方面还保护着工人的国家雇工身份；另一方面，企业组织严重地束缚着工人的行动，各种工厂管理制度很严格，班组车间每天都要点名清查人员。有些工厂还发出通知，如果工

^① 刘爱玉，王培杰. 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209（4）

人出去参加游行马上开除。有很多工人也喊着要“自由”，这种在本质上是反抗资本压迫的要求却并不包含在学生们的“自由民主”之中。于是当学生要求工人站出来，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上街，十年以后就丢了工作的时候，工人并不理解。

私人资本问鼎政治的失败，迫使私营企业不得不戴起了红帽子。1992年南巡讲话打破僵局后，出台大量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金融政策，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迎来飞速发展时期。2002年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指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90年代民工潮出现，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地区。一方面有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另一方面有廉价的劳动力，中国成了资本增殖的天堂。在1992~2002年间，私营企业户数平均增速31.5%，2003年以来平均20%以上。

城市的承包制成功地推动了国有企业资本化。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国企管理者通过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名正言顺成为企业的统治者。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的“国营企业”统一改为“国有企业”，将原全民企业明晰的产权改得模糊不清^①，为下一步将产权明晰给管理层的私有化奠定基础。同年出台《公司法》，所有企业、工厂都改成公司，以法的形式确立了对管理者非常有利的管理体制，并规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营上从“国营”转向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95年出台《劳动法》，对劳动者进行规范。在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继89赵紫阳“亮剑”以后，97年朱镕基展开决战，对国企工人大规模进攻。十五大提出了“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即为

^① 《智囊财经报道》2003年7月21日《从“国营企业”到“国有资产”》指出：“国营企业”一词正式被“国有企业”取代，一字之差映射着的是很大的制度变迁。在“十六大报告”中没有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而是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办法。过去的提法是“国营企业”，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后来的提法是“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不经营；现在是国有资产，国家只管资产，企业如何经营与政府已经彻底脱钩。（网址：

<http://business.sohu.com/98/20/article211312098.shtml>）

战略性改组的完整方针，国有企业全面转轨，建立公司制和股份制，同时众多企业由于内部、外部多方面因素先后改制破产，将工人抛向社会。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口号之下，诸城陈卖光式人物大量涌现，相当数量国企以 MBO、低价出售的形式实现改制^①。按照世行的调查，诉诸于内部人收购的改制模式的比例达 60%~70%^②。这一做法引发了 2004 年的社会大争论，郎咸平认为 MBO 实质是保姆侵占了主人的资产。国资委则不为所动，李荣融旗帜鲜明地提出最终目标：“该卖的卖、该并的并、该放的放，我们计划目前这么多的中央企业最后就保留 80~100 家，最多剩 100 家。”^③截至 2003 年底，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面已达 85%，全国 4233 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 2514 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 60%。

伴随着 90 年代以来的招商引资潮，外资也在稳步进入，同私有经济发展、国企改制彼此呼应，形成了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繁荣局面。2006 年 12 月，在开远市营造创业环境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市长李存贵讲出了一番颇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話：“资本的本性是增值。马克思说：‘在资本的背后站着它的监护人’。资本要增值，必须寻找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即扩大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占有率，意味着开放，意味着扩张。所以鸦片战争是一种必然，资本必然要进来，不让进来就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背后就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在起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就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资本的本性决定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正是李存贵这样的“监护人”不断“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 20 多年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原有

^①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 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131-166

^②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合作完成的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截至 2004 年 12 月以前）抽样调查的报告，该报告于 2005 年 4 月正式发布。详见中国产权网的报道《管理层收购细则尘埃落定 国资委终结“隐性 MBO”》（网址：http://www.eoechina.com.cn/news/news_single_show.asp?n_id=2785）

^③ 2004 年 12 月李荣融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详见新闻《李荣融横向整合编“国家队” 央企最多只剩 100 家》。（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1/01/content_2406007.htm）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中国的无产阶级承受着最尖锐、最露骨的社会灾难，他们也肩负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商品化的同时，农村劳动者不断无产者化，同时大量知识分子也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扩张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一、传统工人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后，经过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也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传统国企工人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斗争的方向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工厂都是老一代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起来的，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厂为家，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但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相当多数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庆工人成立“工纠”，跟随党内当权派，同造反派对立。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机械厂^①为例，1983年机械厂开始对直接生产工人实行超额计件工资制，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颁发超额奖，全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资增长13%。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②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工人日报》指出：“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6年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③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因为此时工人队伍已经瓦解，所谓的劳动积

^① 游正林. 内部分化与流动——一家国有企业的二十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② 刘卓红. 现代化建设主体——当代工人阶级地位研究[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p273-289

^③ 冯同庆，围绕工人阶级理论的争论与工人阶级状况

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改革家们对管理层独霸工厂的原因睁一眼闭一眼，相反紧紧抓住怠工的结果，视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现，并建立严厉的工厂制度，防止“性本恶”的工人们“偷懒”。

从1985年起，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上缴利税总额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0.7%。这一阶段，工人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但工厂内的差距迅速扩大起来。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没有统一和科学的标准；在企业内部，根据游正林的调查，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现代化大生产彼此之间的联系密切，很难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来计算劳动成果，再加上辅助工人和非生产工人没有有形的劳动产品，因此工人的工资改革变成了普调。同时也开始发年度奖和红包，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90年代战略性改组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工人开始下岗，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这一时期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

有的冲击，迫使工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①。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从1998-2001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250万职工下岗^②。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岗职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从三年攻坚开始，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国8万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涉及400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40%多^③。

传统工人中不同的群体很多。退休工人约有3000万（国企退休2300万、集体退休630万），历史上以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完成工业化建设，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帐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来进行斗争，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位退休女工回忆这一过程：“前些年不给我们发退休金，我们去找单位，单位说没有，让去找保险公司；去找保险公司，说单位没给交，单位没存钱，为啥给你们；返回头又去找单位，单位说没钱；后来又找市委，集体找了几次，才给我们发退休金。要是不去找，一分钱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退休工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存在特殊性。抚顺市民政局一个主任这样解释：“现在抚顺失业率这么高，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养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这样小的就闹不起来了。”吉化的一位退休女工：“我现在和两个儿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一家七口。我的退休金400元，老伴700元，俩儿子都在吉化上班，但儿子、儿媳全开不了工资，一家七口就指着我俩的1100元过日子，勉强只够生活。儿子是集体工人，也是吉化建筑公司的，月工资应为800元，但发不下来，单位说缺钱所以少开，三、四年不开支了。现在的世道都变了，青壮年都没工作，反过来要靠老人养。”抚顺矿区一位32年“矿龄”的老工人，儿子儿媳下岗后

^①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 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39-45

^② 胡鞍钢. 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若干看法（网址：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810）

^③ 于建嵘.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没工作到沈阳打工，把刚刚 5 岁的小孙子留在家由老人带着，他无奈的说：“为什么当矿工光荣了三十几年，到这么大岁数了不仅要养儿子还得养孙子……？”^①退休工人同企业分不开，“虽然我们现在都是由社会统一发放工资了，但我们俩对工厂还是很有感情的。我虽然不在厂里上班了，但我的孩子还在厂里；工厂好了我虽然享受不着，但我看着也高兴。我们退休的都是这个想法。”^②

传统工人中下岗职工的斗争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持久的。^③根据 2004 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 48.4% 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 46.7% 要求工作，43.3% 要求收入补助，8.3% 要求惩治腐败问题。在集体行动中，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参与集体行动的下岗职工中 57.4% 参与过集体上访。通过现实的教育，工人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

官方宣传，“三条保障线”是缓解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有效途径，但事实上即便进了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除了前三年能领取生活费以外，他们与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没什么区别。长春拖拉机厂 1998 年设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该厂劳资科科长说法，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率达到 100%，不仅基本生活费足额发放、社保费用定期缴纳，而且还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按照“三条保障线”的标准，长春拖拉机厂做的已经很好了，但该厂几位工人的话却揭开事实的真相：“进中心是进了，可有个屁用啊！一个月就那么点钱，现在我们出中心了，年纪大，没技术，找不着活，只能在家待着。”“我 98 年下岗，01 年出中心，也没谁跟我说什么失业救济金。反正现在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单位却说什么不交供暖费，这个冬天就不供暖，这也太没道理了！你（单位）不能不管我们，我们这次（示威静坐），就是让单位解决供暖的问题，这钱我们是不能自己交的！”进入再就

^① 吉林大学刘岩等，铁饭碗消失之后——东北三省四市国企 职工生活、就业状况调查，2006 年

^② 籍磊，田冠浩，“单位—社区”的运行模式分析——以中航一集团 5704 厂社区为例

^③ 从 1992 到 2002 年，累计下岗 7000 多万人。每年下岗人数由 1992 年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97 年的 1151 万人，后下降到 2002 年的 618 万人。

业中心，也不意味着是企业发善心，长春一家面粉厂一位下岗职工这样说：“我是 2000 年 6 月 1 日下岗的，一下岗厂子里就给办了下岗证，也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我在里面待了三年，每个月可以领到 170 元的下岗补助。”“为什么单位要给我办下岗证？因为它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啊！我们名义上下岗失业了，可单位还是让我们去干活，一天给 8 元钱。而且单位还规定，不办下岗证不能上班，办了才能上班。照我们的理解，厂子这么做就是为了套国家的钱。你看，我们下岗了，单位就不用给我们交每月 188 元的养老保险，以前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后现在呢，失业优惠证（即再就业优惠证）也必须办，不办就不让上班。到了后期个人懒得办的，干脆是企业替他办。我们办了优惠证，它（单位）再把我们招回来，它就可以享受免税。单位里没有办下岗证和优惠证的（职工）真就没给再安排工作。他们有的买断了，有的就长期放假，但都没活做。”^①

很多下岗职工已经同企业有偿解除了关系，但改制引发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企业破产后经济欠帐很多，根据陕西省总工会对 29 户困难国企调查显示，拖欠医疗费问题普遍严重，被调查企业共拖欠退休职工医疗费 6323 万元，拖欠个人最多达十几万元、拖欠时间最长达十几年，其中有 1/3 的企业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职工的医疗费。^②根据湖北省总工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 60 家改制企业中，有 5 家拖欠职工工资，11 家拖欠职工集资款，13 家拖欠职工医疗费，18 家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③。因此国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资、要补偿和社保等为目标，以捍卫国有资产、反腐败为形式进行斗争，阶级意识逐步加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教育了传统工人，开始重新认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历史。下岗工人讲：“毛主席给个铁饭碗，d xp 钻个眼，jzm 踩个扁，zrj 踢个远。”吉化的工人讲：“这几年发展迅速，是什么

^① 吕鹏. 制度是如何封闭的？——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为例. 学海, 2006 (1)

^② 张帆. 困难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盲区（网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③ 王四新, 鄂慎公. 湖北调查-改制企业职工权益状况不令人满意. 工人日报, 2004 年 12 月 24 日

发展迅速，无非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迅速罢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吉化用了几年就完成了”。工人感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①“毛主席时代，工人有股精神，不受气，是工厂的主人。邓小平时期，工人手里有一点钱了。现在权利都让给了外国人，领导剥削、压迫工人，只满足了少数人的利益。国家性质只是挂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养老、医疗保障，有工作积极性。国企工人无法忘记毛泽东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为工人谋福利的。“那个时候，工资照发，工作不累，医疗公费，谁会说主席不好？”“毛主席活着，每月挣三四十块钱，干得可有点劲呢。吃的用的都不缺。现在连最低的生活保证都没有了。”“还是毛主席时代好。现在啥都出来了，当时的地主也比不上现在，有钱就什么都有，没钱啥也没有。现在大学都不念了，念不起；要找工作，还得花钱。现在年轻人结婚也不要孩子了，承担不了，不敢要，自己还靠父母养着，哪敢要孩子。”

二、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 970 万。从 1988 年～1991 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 1000 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 2～3 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 1.4 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一个来自湖南的广东打工者说：“我的一切都与父辈们不一样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娶老

^① 网文，吉林调查材料

^② 网文，洛阳市工人现状调查报告

婆生孩子。我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学会一门技能，在这里扎根。”^①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 17.4% 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 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 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 5.5% 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②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 7 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40.31%，初中占 48.07%，高中以上仅占 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 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 1992 年到 2004 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 68 元。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 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 13.6 万人，农民工占到 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 50 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 50%。2004 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 3 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 4 万截。根据 2004 年浙江 7 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 24.4% 的人会去医院；14.9% 的民工是 8 小时工作制，38.5% 的民工每天工作 8~10 小时，29.5% 工作 10~12 小时，15.5% 工作 12 小时以上；只有 6.7% 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 的农民工有 1 天休息日，56.3% 没有休息日。^③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 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 100 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

^① 中国网，广东新一代农民工：“我与父辈不一样了”，2006-3-28

^② 朱秀英等. 中国工人阶级现状与发展趋势[M].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p236-243

^③ 张戈. 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J]. 浙江人大, 2005 (1)

计显示，2004 年 1 至 7 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 540 宗，涉及人数 5.73 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15.4% 和 17.7%。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 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 530 多起，第三季度 590 多起，占 42.6%；1999 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 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 2002 年的 14.5 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 年几乎翻番，为 27 亿元；而 2005 年、2006 年都达到 58 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①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 3000 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 6000 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① 哈晓斯. 劳动合同法 走近亿万劳动者. 劳动保护, 2008 (1)

三、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①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②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③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

^①《马克思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页。

^②资本论，一卷，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③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马克思选集4卷

根据 2006 年人事部调查数据, 6 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 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 1100 元, 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 1000 元左右, 且近年来呈不断下降趋势^②。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③, 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 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 “跟农民工抢饭碗”^④。因此, 准确地说, 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

目前, 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 6000~7000 万。包括: 机关办事人员 1000 万, 平均劳动报酬 17644 元^⑤; 专业技术人员 3533 万, 其中事业单位 2613 万, 平均劳动报酬 16458 元; 企业办事人员 2080 万。

四、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 年 10 月,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 《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 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 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 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 加强劳动保护; 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 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 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① 网上新闻. 人事部调查数据: 六成应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② 网上新闻. 大学生农民工谁的工资高

^③ 网上新闻. 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④ 网上新闻. 浙江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 与农民工抢饭碗

^⑤ 此数据依据 2004 年劳动统计年鉴。与陆学艺提供的数字有较大冲突,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测算, 约为 3400 万。

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①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②。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③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② 吴清军。下岗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实践运作。现代经济探讨，2005（12）

^③ 张帆。困难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盲区（网址：

<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分别为 35.5% 和 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①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 5 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 56-60 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②，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③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

^① 孙立平等：《制度与实践：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学海，2005（5）

^② 网文，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2004

^③ 田嘉力，谁能把民工退保信息带上“两会”，2008 年 3 月

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再造资本家阶级

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①。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进一步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被消灭，但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本家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完善形态，因此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创造资本家阶级再生的条件。

马克思在谈到由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资本加速积累时指出：“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适时地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③再造资本家阶级也是同样的过程，以国家的力量，通过信贷、税收等多种政策，使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直接或间接的转化为私人资本，并逐步加入全球体系，创造有利于资本成长的国际、国内条件，“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最终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用30年时间走完其他国家200年的路，成为“世界工厂”。

再造资本家阶级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原始积累、国内市场和雇佣劳动力市场。

^① 列选三卷，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③ 《资本论》三卷，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一、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歷史結果，而是这种生产的歷史基础。”^①改革前，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无论农民还是城市居民，个人手中只有必需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极少，只有小农具、小工具。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我国农村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财产主体一直是集体即生产队，农户的私有财产极少。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每个农户平均拥有住房3.64间(其价值不超过500元)，年末储蓄余额32.09元，除了一些简单低值的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外，物质资料储存也很少。^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土地由农户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农机工具等集体生产资料一般都折价归户，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据统计，1978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达到977亿元，到了1986年末，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已经只剩下不到30%。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绝大部分农村都变为个体经营，农用机器20%承包给个人，80%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大队领导及其亲戚、朋友。^③同时，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迅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推算，农户私有财产1985年比1981年增长1.68倍。从1983-1985年，农民私人拥有的大中型拖拉机由27%上升到62%，小型和手扶拖拉机由68%上升到89%，农用载重汽车由33%上升到61%，农户拥有的脱粒机、磨面机、碾米机所占的比重都在50%以上。1987年，农户拥有的生产资金占农村生产资金的比重，从1980年的9%提高到54.2%，农村生产资金拥有量已由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④“小生产每时每刻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随着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剩余资金增长并逐步转化为资本。农户储蓄年末余额从1980年的117亿元增长到

^① 资本论一卷，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② 潘石. 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p25

^③ 韩丁. 大逆转 解读改革：1986年农村的变化

^④ 张厚义，秦少相. 我国私营经济的现状. 中国农村经济，1988（12）

1986 年的 766 亿元，少数有劳力、资金的农户开展多种经营，形成了“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①和新经济联合体）。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 28 省、市、自治区的 272 村 37422 户调查，1984 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总数的 3.2%，专业户占总户数的 3.5%，个体工商户占总户数的 4.4%。1984 年同 1983 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型固定资产增加 23.6%，专业户增加 51.0%，收入万元以上的专业大户增加 62%。1984 年末，专业户平均有剩余资金 1052 元，是一般农户的 9.6 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年均纯收入万元以上的大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 0.8%。1984 年末，“万元户”平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4786 元，比一般专业户高出 58.5%；拥有机械动力 26.6 马力，比一般专业户高出 96%。据统计，1984 年共有各种形式新经济联合体 5.9 万个，从业人员 50.3 万人，形式多是个人入股，每个联合体平均投入资金 8273 元，平均获得营业性收入 3.1 万元。根据温州市委的调查，1982 年全市有专业户、重点户 20 万户，占农村总户数 16%，其中 50 户比较拔尖的户均纯收入 7150 元，比全市农村人均收入高出 3 倍。城市的个体工商户也开始进行原始积累过程。为解决城镇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国家制定了有关政策，允许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79 年初北京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工商局长会议，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等个体手工业劳动。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个体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1978 年底个体工商户 14 万人，1980 增加到 81.4 万人，1983 年增长到 208.6 万人。不仅数量增加，经营规模也在扩大，一批个体户逐渐成为“个体大户”或“雇工大户”，逐渐演变为私营企业。在城乡个人积累自由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贷款、个人借款、社会集资等为私营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 1988 年全国 97 户私营企业典型调查，私营企业初始资金 41% 来源于银行、信用社贷款，37% 来源于自有资金。^②

^① 专业户指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生产，收入成为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60% 以上的农户；重点户是指以家庭主要劳动力或者辅助劳动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50% 以上的农户。

^② 木志荣博士论文《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第二章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①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不掠夺人民大众、不瓜分公有制是无法完成原始积累过程的。80年代后期开始价格双轨制成为少数

“能人”捞取第一桶金的渠道。据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调查，到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1989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约为44%（以金额计算仅为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数量45.4%、钢材29.7%、木材21.7%、水泥15.5%。②最热门的是开公司，最盛行的是倒批文，批文换钱成就了先暴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据估算，仅在1988年，我国商品价差总额就超过15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达3500亿元以上，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转化为官、商们的原始积累。③南巡以后，囤积物资之风再兴，同时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地产、股票也成为暴敛财富的手段。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动员村干部动用全部资金，囤积原材料，吴本人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海南兴起炒卖地皮，从1991年6月到1992年6月，海口公寓房售价从每平方米1200元上涨到3500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据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从政府部门出身的“万通六兄弟”在海南靠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其中的潘石屹后来再回北京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开发了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瓜分国企是最后一轮合法的原始积累。南巡讲话以后，中策集团黄鸿年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大旗，首先在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支

① 资本论一卷，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② 老物价记者。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结束。价格理论与实践，1999（11）

③ 林新真。价格双轨制市场化改革思路。发展研究，2005（4）

持下，与太原橡胶厂合资；转战杭州，在市长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黄收购了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两家效益很好的企业，同时还“搭购”了一家亏损的电缆厂；来到老家泉州，黄问市长，如果把全市 41 家国企“一起合了行不行？”泉州市委书记当场给省里的陈光毅书记和贾庆林省长打电话，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两天两夜内，我们喝了一两瓶茅台酒，把这个项目签了意向书。很快，在 7 月 1 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在香港签下正式合约，向党的 71 岁生日献礼”；然后继续高举高打，用好政治牌，趁热打铁在大连一揽子收购了 101 家国营企业。从 1992 年 4 月到 1993 年 6 月间，中策集团斥资 4.52 亿美元购入了 196 家国营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 100 多家，在短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黄专选资本质量好、有盈利前景的国家骨干企业，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包出售的计划。在收购之初，黄将太原和杭州的两家橡胶厂纳入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增发新股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然后，他又用募资所得的一亿美元先后收购了重庆、大连、银川等地的三个轮胎橡胶厂，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厂中有三家是我国轮胎行业的定点生产厂。在啤酒行业中，中策收购了北京、杭州以及烟台等地多家啤酒厂，组建了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招股上市成功。数年后，黄鸿年又将手中所持股份整体出售给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随后，主流经济学开始“上纲上线”地为私有化唱赞歌：“中策现象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黄鸿年的购并终于让国有企业实现了多年未有突破的产权多元化。刘国光评论说：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国外企业上市的原则和渠道把一些国营企业经过重整后，转换成为具国际性的企业，陆续在国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国外资金来投入国内企业发展。^①由此，在产权改革的导向下，大兴化公为私运动，一大批国企管理者们冠冕堂皇的成为私营业主。

站在加速原始积累和资本运动的立场上，90 年代张曙光就曾指出：腐败是“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经济体制改革的

^① 吴晓波. 激荡三十年. 中信出版社, 2008

目标是“从集中计划制度走向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要把很大一部分公共决策变成私人决策，把这部分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而腐败正是一种权力和利益转移的方式，“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①根据胡鞍钢测算，90年代后半期，仅寻租、地下经济、税收流失、公共投资领域等四类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每年规模上万亿。^②腐败如此大规模的化公权为私权，如此符合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二、国内市场的形成

资本是一种运动。一定数额的资金化为资本，必须借助于国内市场。在资本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上，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完成G—W的流通行为；在资本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上，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完成W—G的流通行为。^③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生产资料和产品直接由国家调拨和分配，在这种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营经济是无法孕育产生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市场调节受到重视。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将计划同市场结合起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详细阐述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① 张曙光. 腐败问题再思考. 读书, 1994 (2)

^② 胡鞍钢. 腐败黑洞: 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 民主与科学, 2004 (4)

^③ 资本论二卷, 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作出我国现阶段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明确提出要有步骤的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加强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1979年以前，国家对25种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到1985年，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基本消灭，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实行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在工业生产方面，1978年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有120种，到1988年缩减为60种。从1984—1988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900多种减少到380多种。在分配领域，1979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256种，1985年减少到26种；在商业系统，国家计划收购和调拨的产品，1978年为188种，1984年减少到60种，1985年再降为23种；在进出口领域，1978年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协调的出口产品500种，1985年减少到31种。

“三多一少”的商业改革^①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在生产、分配、交换领域的作用，促使国内市场蓬勃兴起。在生产资料领域，1979年以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开设了一大批生产资料商场，在这些商场中，交易活动不受行政区域和部门的限制、不受企业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可以自由选购。1984年以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物资贸易中心和钢材等许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如温州农村生产资料市场150个，其中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50个、农业生产资料市场25个、建材市场75个，成交额3亿元。同时国营商业、供销社和政府组建了一批综合性或专业性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不分公私，私人投资者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从事私营企业生产和经营最基本生产资料（如设备、钢材、能源等），也可以销售商品，从而为资本流通开辟畅通的市场条件。生活资料市场同步形成。以浙江为例，1979年，城乡集贸市场达到1322个，年成交额增至11.3亿元。随着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异军突起”，大量的工业品开始进入集贸市场，商品市场很快形成。温州、义乌、黄岩等地都出现了全国首批工业小商品市场。仅1982年～1984年，浙

^① 1981年针对中国商品流通渠道过于单一的特点，有人提出“多条流通渠道势在必行”的观点，“为了改革中国商品流通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等缺点，应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方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商业体制”。

江的这类小商品市场就由 58 个增加到 252 个，年成交额也由 1.1 亿元增加到 4.3 亿元。到 1984 年底，浙江的城乡集贸市场已达 2241 个，年成交额有 26.9 亿元。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材料和日用品市场进一步扩张。^①

经由 80 年代末的价格双轨制，92 年后迅速走向市场化的单轨制。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内市场空前发展并最终成熟。到 1997 年，生活资料市场零售总额达 2.68 万亿元，生产资料市场销售总额 3.67 万亿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20 倍。除传统的食品、服装、日用品市场外，还形成了音像产品市场、家用电器市场、装饰用品市场等新兴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顺利发育，形成了以全国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为枢纽、区域性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代理制、配送制、期货市场、拍卖市场、租赁市场也成为生产资料市场中的新形式。各地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四大后各大中城市均设立了城市市场网点建设办公室，并建立了专项基金，将城市商品市场建设纳入了城市建设规划，政府从商流、物流、信息流等多方面为完善市场功能创造条件，在农村则把建设市场网点与发展小城镇有机结合起来。以湖南省为例，“八五”期间市场建设投资达 70 余亿元，相当于“七五”期间投资额的 7 倍，到 1996 年底全省拥有各类商业网点 116.1 万个，各类市场 3998 个，其中营业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市场 295 个，年成交额 1 亿元以上的市场达 89 个。1997 年全国各类消费商品市场达 88000 多个。^②1999 年末全国批发零售贸易业机构（网点）达到 2000 万个，从业人员达到 5800 万人。到 2001 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93085 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 47152 个，农产品交易市场 27167 个，工业消费品交易市场 10163 个，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6631 个。2001 年全国城乡集贸市场交易额达 2.49 亿元，比 1989 年增长 11.6 倍。^③

^① 曹兼善.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② 柳思维. 中国商品市场的历史性巨变——综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品市场. 2005-12-20

^③ 网文. 迎接十六大之九：市场供求实现由紧缺到宽松

三、劳动力市场形成

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资本运动的最关键要素。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民一年的劳动日从 50 年代中每年工作 119 天增加到 70 年代中每年工作 250 天。^①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供资本榨取的，所以改革派一定要污蔑集体化是“大锅饭”、“养懒汉”，并最终解散人民公社，把农民变成任资本驱使的“懒汉”。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据估计在 4 亿劳动人口中有 1.2 亿人“过剩”，需要在非农产业另谋出路。同时，“两户一体”急需雇佣劳动力。专业户扩大经营的途径之一，就是雇工经营。据农区户调查，雇请长工（6 个月以上）的共有 203 户，占调查总数的 0.55%，占专业户的 15.7%，平均每户雇请长工 4.1 个。一般来说，经营新兴产业和收入高的农户，雇工就多。新经济联合体雇工经营的占其总数的 51%，平均每个联合体雇工 7.9 个，合 1204 个工日；专业户雇请长工的共 203 户，占总户数的 0.55%，占专业户数的 15.7%，平均每户雇长工 4.1 个。按收入划分，家庭纯收入 6000~9000 元的户，占调查户的 3%，而所雇长工却占长工总数的 50%，家庭纯收入 9000 元以上的户，占调查户的 1%，而所雇长工却占 40%。在私人雇工户中，雇工 8 人以上的有 25 户，占调查户的 0.07%，占私人雇工户的 12.3%，平均每户雇工 18.5 人。^②同时，伴随知青返乡，城市也出现大量“剩余”劳动人口，1978-1985 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人口 2600 多万，其中待业青年 1800 多万。1980 年 6 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摒弃城镇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包揽的制度，“在国家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1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指出：“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于是剩余劳动力或开办个体户，或者以帮手、学徒身份当雇工，为资本提供劳动力资源。政府从

^① 金宝瑜.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 批判与再造

^② 张厚义. 中国大陆私营经济的再生与发展. 社会学研究, 1993 (4)

税收、贷款、场地、政策等各方面扶持个体工商业，在全国各类城镇中一批个体工商户，通过雇工经营扩大规模，成为私营企业。据湖北省4个县的追踪调查，1983年-1985年，雇工户由509户增加到2543户，雇工人数由3246人增加到15838人。雇工户数和雇工人数，在三年内几乎都增加了4倍。据辽宁省调查，1983年有雇工企业5220个，雇工人数40478个；1984年比1983年分别增长2.57倍和2.28倍；1985年又比1984年分别增长95%和90%。

雇工问题引起的争论很广泛。尽管1981年国务院108号文件《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允许请“帮手”、“学徒”，但同时对雇请人数做了最高限定。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资金雄厚、雇工超过8个的大户。广东省高要县沙浦公社农民陈志雄1979年开始承包鱼塘，1980年增加到105亩，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工日，当年获得净收入1万多元。从1981年5月到9月，《人民日报》就此开展专题讨论。面对质疑和争论，1982年经邓小平提出，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对雇工大户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1983年1月邓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有什么危险。”“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的对或不对的标准。”1983年年初，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对雇请较多帮工“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对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不按资本主义雇工经营看待，采取“不鼓励，不禁止”政策。根据1987年的调查，城乡私营企业雇工达361万人，平均每户雇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80%，雇工超过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1987年初中共中央《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

步引导的方针”。同年十三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他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国家从根本大法上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雇佣劳动作为私营经济的基础，也自然而然被肯定下来。

伴随着90年代的民工潮和国企工人雇佣劳动力化过程，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四、私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资本从社会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农村开始发展，但促使其繁荣的土壤并不在农村，而在城市。随着国内各类要素市场的发育成熟，促使资本从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城镇私营企业户数占全部私营企业的比例从1990年的38%上升到1996年的60%。^①资产阶级撕下了社会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按照资本的意愿将医疗、教育等事业产业化，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和日渐衰落的农村，“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

南巡以后，政府官员中出现下海经商热，大批转化为资本家。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同时，

^① 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② 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资本家越来越融入“体制内”，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同党政体系关系日益紧密。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当权者将党看作一个“大熔炉”，通过将资本家等“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标志资本家由“体制外”成为“体制内”。2003年私营业主有34%是党员，其中在改制而产生的私营业主中，比例高达50.66%。从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来看，党龄在10年以上的人占74.2%，也即大部分私营业主不是在2001年七一讲话后新发展的，而是原先就是党员干部、后来转变为私营业主。在当前社会条件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私营业主不需要通过党政以外的途径解决问题。私营业主可以直接收买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据统计2003私企的公关、招待费用占纳税的18%；同时私营企业还招聘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事实上私营业主群体已经和党政机关日益紧密融合在一起，私营业主当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压迫的中间阶级。

从90年代起，私营业主大范围参与国企私有化。私营业主开办企业前的最后职业，企业负责人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15.4%上升到2002年的55.4%，普通工人、农民从36.2%下降到6.7%。2002年私营业主的职务经历中，干部、国企承包人（相当于分厂厂长）、企业供销人员占72.7%，越来越多的干部不要官位，要自己做老板。在2002年的300万户私企中，有18.3%的被调查企业是由国营、集体改制而来的，6.3%的企业已经兼并或收购了国有企业，还有10.2%的企业正在准备兼并或收购国有企业，总计比例35%。考虑到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私企才能涉足，大部分大中型私企都卷入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当中。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同时明确规定，允许私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进入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并鼓励其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非公有制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参与其分离办社会职能和辅业改制，在资产处置、债务处理、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参照执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应政策……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吸引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建设和参与国有企业重组。”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家为牟求高额利润，竭力压低人工成本，甚至故意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如不履行劳动合同、随意解雇职工、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近年来，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由于企业侵害职工权益而引发集体停工、罢工、上访等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 30~40% 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 GDP 的增长速度。私营部门是劳资矛盾的重灾区。2002 年，全国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中，非国有部门占 72.9%，私营部门在非国有部门（私营、三资、个体）中劳动争议和劳动报酬争议中的比重分别占 44.8% 和 49.5%，远远超过其他非国有类型。在私营企业中，中小私营企业的劳资矛盾尤为突出。在浙江的有关调查^①显示，国有、集体企业执行劳动时间规定比较好。大量中小私营企业严重超时劳动较为突出，日劳动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的企业比较普遍，星期天很少休息，这种情况在制革、电器、编织、成衣、皮塑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严重。有 41% 的职工日工作在 12 小时以上，有 52% 的职工为 8 小时至 12 小时，只有 7% 的职工为 8 小时以下。长期超时劳动、过度疲劳也促使大量安全事故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大部分私企尤其中小私企，已经血汗

^① 私营部门：劳资关系及协调机制。国家发改委研究所非国有经济课题组的阶段性专题报告。管理世界，2004（6）

工厂化，并同跨国公司紧密结合，形成打工经济格局。联想集团拒绝倪光南的芯片道路，而选择组装，就是其中的代表。借助于同政权体系的紧密关系，资本家在工厂内推行军事化管理，牢牢控制党组织、工会等工人可能的组织途径，严厉处罚、打击敢于反抗者。工人如果想进行经济斗争或争取民主权利，私营老板都是其直接的敌人。

资产阶级“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替代了旧时的天国。”^①改革派始终牢牢抓住唯生产力论的救命稻草，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终结老左派“姓社姓资”的争论，在致力于“国民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借口下，实际上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同时倾举国之力为资本发展架桥铺路，加速剥夺小生产，瓦解老工人、压制新工人，创造最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天堂。

^① 《资本论》三卷，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①。改革开放是在“摸论”等实用主义指导下的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尝试改变政策建立有利于资本成长的社会环境。开始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并不明确。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②。1980年1月16日又讲“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③。这一阶段邓小平尽管提出了“市场经济”，但思路与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相一致。1982年12月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也被人叫做陈云的“鸟笼经济”，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笼子，鸟只能在笼子里飞。“鸟笼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市场调节为辅，主要是指农村市场，82年农村承包到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自由；城市里也允许有限范围内存在的一些资本，但当时城市里主要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是计划配置的。

80年代理论界大量引入东欧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追捧西方的经济模式，其目的是解决如何创造条件形成商品市场的问题。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单从这句话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内容，好像毛时代也是这样的，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农村里资本已经合法存在的情况下，推进城市里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于把商品交换、市场交换原则渗

^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67页。转引自：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Dongoujigg/002.htm>

^② 邓选二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

^③ 1983年版邓选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后来在1994年版邓选二卷中，适应形势需要，这句被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透到生产资料领域，而在毛时代全民所有制工业内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①。同时伴随以大规模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把企业租赁给厂长个人。一旦企业有了自主权，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资料也不再按照原来的计划调配，那么企业之间就可以为市场、原料进行竞争，市场经济下工厂的独立利益初现雏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负盈亏”使企业具备资本特征，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竞争，这相当于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降格到集体企业，变成恩格斯批判的杜林的那种“经济公社”。

从社会消费来看，生活资料也开始商品化，尽管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还是计划配给。为麻痹工人，采取给“胡萝卜”方式，国家职工普调工资。在市场上物质也较 70 年代丰富，猪肉等都可以买到，还有电冰箱等轻工业品，很多工人看到眼前利益也很高兴。有些学者因此将 80 年代称为各阶层共赢的阶段，事实上是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的过渡阶段。官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体制变化”，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就像三聚氰胺带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可以变成蛋白质一样。84 年启动商品化进程，是计划经济瓦解、市场经济形成的关键环节。

到了十三大，提法就发生重要变化。在 1987 年 2 月 6 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②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计划权放给企业，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从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同全社会生产的盲目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形成。自此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市场经济，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最主要的对象还是城市的公有制企业。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出现双轨制；生

^① 吴易风. 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5, 12 (5)

^② 邓选三卷，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 年 2 月 6 日

活资料上，计划管理范围迅速缩小，大部分必需品都由市场配置，除统治集团以外，福利住房基本上不再分配。同时，国企工人合同化，农民工大量进城，国内统一的劳动力商品市场也逐步形成。

89 以后，邓不得不把赵当成牺牲品，改革派暂时退却。老左派的影响盛极一时，江当时说要把违法的私营企业“搞得倾家荡产”，“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拾遗补缺，不能本末例置，不能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①邓于是南巡，由杨尚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江妥协。邓的南巡讲话打垮了老左派。92 年十四大最终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完成了“飞跃”。但十四大只是斗争的表现，还不是结果，十四届三中全会最终取得这一战役胜利，作出执行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93 年通过《公司法》，允许国企破产；94 年通过《劳动法》，确定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此后的一系列制度、政策确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全面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完成从资本培育、扩张到确立资本统治地位的过程。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种种矛盾及其后果已经展现出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资本无节制发展已经到了“不科学”的程度。即便资本主义要实现科学发展，也必须节制资本，到目前为止尚无这方面的政策，所以看不出什么“科学发展”，现在还是伪科学盛行的时代。

^① 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89 年 8 月 21 日

社会主义与西藏问题

2008年3月，藏独问题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在谴责达赖集团颠倒黑白、分裂祖国的恶劣行径时，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不禁要问：为什么原本在藏区销声匿迹的藏独势力会再次兴风作浪？到底哪些因素使藏独获得发展的空间，哪些人在支持分裂势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西藏问题未来的前景是怎样的？本文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来研究这段历史的。

一、民改以前西藏的阶级状况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差异，民国时期西藏封建农主制度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卫藏溪卡庄园制，其规模一般为一百来户，土地一两千克，小的溪卡有十几户乃至数十户，大的溪卡有二三百户，土地数千克。溪卡（大村庄）中央建有领主的高大楼房，围绕着领主大院是星罗棋布的农奴和堆穷的平房住宅。溪卡有套完整的管理机构，设有“溪本”、“涅巴”（小管家）、“基根”（管理农奴）、“根保”（村长）、“定噶根保”（管理农业生产）、“萨斯根保”（管理牛马差役）等等。领主对土地采取以徭役地租为主，实物和货币地租为辅的经营形式。第二种是昌都领主庄园制，土地和人口都比较分散，领主把分散的土地和农奴分别委托给各级头人管理，由农奴分散经营。多数地方采取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为辅的经营形式，同时也指派一定的乌拉差役。第三种是牧区部落制，主要在藏北羌唐草原、阿里的北部纯牧区。从元朝起，对各部落的头人委以“千户”、“百户”等世袭职位，进行管理。这些千、百户除占有世袭的领地草场外，还占有较多牲畜。西藏所有部落都归三大领主管辖，部落头人由领主委任，有些甚至直接由领主派管家管理，领主按牧场派差税。

占总人口2%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官家

即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耕地 128 万克（约占西藏总耕地面积 330 多万克的 38.9%）和 30 多万农奴。官家的庄园称“雄溪”，由官府直接管理，它把土地以一定的租额交农奴耕种，然后将收受租税按比例充作所辖各机构经费和用作各级官吏的俸禄。贵族是历代中央王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所封的僧俗封建领主，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贵族 642 户^①。贵族子弟生来就可以做官，就可以掌握压迫掠夺人民的权力。每家贵族都占有庄园、牧场几个到几十个，占有耕地数百克到数万克，占有农奴、奴隶数百人到数万人。贵族的庄园称为“格溪”（私人庄园），共占有土地 97 万克，约为西藏土地总面积的 24%。寺院和僧侣贵族也聚敛了相当富裕的资财，而且还拥有大量的庄园和属民。僧侣贵族包括以下 3 种：第一种是转世活佛（藏语称为“朱古”，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制度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分配的重要手段，经过明、清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到清中叶时形成了庞大的活佛转世系统。西藏活佛可分为政教领袖、“甲波朱古”等不同等级，无论等级高低，都有“拉让”（即活佛私邸），西藏地方政府专派札萨（从三品）管理大活佛拉让的各项事务^②。民主改革前全区有属于寺院领主的大小活佛 500 余人，在 2676 座寺院中，握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 4000 余人。活佛一般都拥有封号、爵位、官职、官品等，大活佛的私人庄园与大贵族不相上下，仅哲蚌、色拉和噶丹三大寺就占有庄园 321 个，耕地 147 万克，牧场 261 个，牲畜 11 万头，农牧奴 4 万余人，为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第二种是在职僧官，体现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原西藏地方政府中僧官占有与俗官同样的比例，按一般说法，僧俗官各有 175 名。这些僧官包括一小部分活佛、高级僧官的亲信佣人、大贵族世家的出家僧人和僧官学校培养出来的专职僧籍人员。第三种是寺院的职僧。寺院除了进行宗

^① 中央政府和噶厦地方政府共同承认的贵族计有 197 家，加上日喀则、昌都等地的一些世袭封建领主共计 642 户，其中前藏 391 户，后藏 27 户，昌都 224 户。西藏旧分康（喀木）、卫、藏、阿里四部。清雍正年间划康部宁静山以东地归四川省，以西与卫部合并称前藏，藏部称后藏。清政府分别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形成达赖掌管前藏、班禅掌管后藏的格局。

^② 札萨之下还设有森本（管理起居）、曲本（管理宗教事务）、索本（管理生活）、强佐（大管家）、聂巴（小管家）等职务。

教活动外，还有经营领地和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主要由寺院中担任堪布、拉吉、吉索、大拉让的德江等负责。寺院和活佛的庄园叫做“曲溪”，共占有耕地 1214400 克，约占西藏全部耕地面积的 36.8%。农奴主的代理人包括三大领主的“强佐”（大管家）、“涅巴”（小管家）、“溪本”、“溪堆”（管理庄园的官员）、“大差巴”和世袭“根堆”（村长）等，占总人口的 3%，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 50% 以上，同三大领主一道成为藏族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

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 95%，但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分为差巴、堆穷、朗生等几个阶层。差巴是指领种农奴主庄园的份地（差地）而支差的人，其领种的份地可世代传继，也可短期出租、典当、抵押，但不能买卖。差巴因其所种差地的来源不同而有政府差巴、贵族差巴和寺庙差巴之分。就差巴内部而言，也因贫富差距悬殊，可分为上、中、下之分，其中，上等差巴约 10%，中等差巴约 20%，下等差巴约 70%。堆穷意为小户，大都是破了产的差巴户转变而来，其经济地位相当于雇农。按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堆穷又有溪卡堆穷、烟火户（多为外来户）和兼营手工业或其它行业的堆穷之分。堆穷的地位明显低于差巴，耕种的土地大都是些质量不好的零星小块土地，例如拉孜宗的桑珠溪卡，1958 年有差巴 17 户 128 人，共有差地 908.6 克，户均 53.45 克，人均 7 克多；堆穷 26 户 101 人，共有耕地 96.4 克，户均 3.7 克，人均不到 1 克。朗生是农奴主的奴隶，占西藏人口总人口的 5%，这些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终生从事繁重的劳动。朗生世代为奴，农奴主可以把他们拿来赠送、交换等。^①

从民国时期开始，西藏虽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主经济依然占绝对的优势。农奴全年的劳动成果约有 70%~80% 为农奴主所掠夺，所剩不到 30% 连维持肉体生存都很困难。此外，高利贷盘剥是剥削、压榨农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债主，负债户约占户数总数的 90%。债主中又以寺

^① 苏发祥. 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和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5）

院领主为主，一般利息率为 30-50%，有的高达 100% 甚至 150%。高利贷是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正像一首歌谣所说的，农奴们“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变本加厉，封建农奴制日益走向没落和反动，成为生产力和发展的严重桎梏。根据史书记载，从 1795 年到 1959 年的 164 年间，土地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萨喀、桑萨一带“早年虽有人户众多，牛羊牲畜蕃孽，后因赋税过重，人口日渐逃亡，现在萨喀、桑萨、偏溪等处，百姓只有二百九十六户，牛羊较前剩有十分之二”。其中又载，“逃走之百姓，因穷苦已极，不能交差”、“硕板多百姓受苦，兼之逃亡过多”。^①阿沛·阿旺晋美曾经回忆：“记得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十世班禅在 1988 年 4 月接受《民族团结》采访时说：“1959 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②

长期以来，西藏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落后，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成为西藏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商品，例如茶叶、粮食、盐、布匹和农具、金属器物等都来自于内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时，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本质逐渐有所认识，因此在采取一系列明智之举整顿、改革西藏经济与社会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和改善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其中经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29 年 9 月 14 日，达赖喇嘛的代表棍却仲尼在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达赖渴欲输诚之内因有五”，其中经济原因就占三条：（1）“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藏绝交，茶价贵至十倍”；（2）“藏边驻军，不能购用中粮，边民困苦，时生怨言”；（3）“藏币重三钱余，英币重七钱余，惟藏币十四五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太大。”^③

^① 陶长松. 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西藏研究, 1999 (3)

^②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中国新闻网

^③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 2481 页，中国藏学研究

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后，西藏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一些西藏贵族出于保护自己特权和财产的目的，在列强枪炮的威力面前转而投靠英国人，最终走上了分裂西藏的“独立”道路。到40年代，演变为以擦绒、夏格巴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藏独集团。

二、一国两制的策略

西南各省相继解放后，毛泽东从总体战略上考虑，解放西藏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造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既定目标，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全国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当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怂恿支持下阻挡我军和平进军，拒绝和谈，并害死斡旋和谈的格达活佛，而我们不得不发起昌都战役时，毛泽东仍提出“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但因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攫取了许多特权，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在内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上层统治阶级既压迫剥削群众，又有代表群众的一面。西藏的主要矛盾是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成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8年间，是集中反帝，暂不反封。对于统治阶级，“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咎既往。”^①因此，十七条协议除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外，规定西藏内部制度不予变更，在较长时间内保留一大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是“一国两制”模式的首次尝试。

十七条协议签订当天，毛泽东指出，西藏“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

中心等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① 阴法唐. 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 西藏研究, 1999 (3)

的民族地区”，从本身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到与祖国的关系及帝国主义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西藏工作一旦发生偏差，不但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造成新的隔阂，给国外敌对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增加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①在十七条协议中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但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这就是说，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要在群众要求改革而上层又同意改革时才进行改革。但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只要还有一点赖以生存的武装，总是不会轻易让步的。1952年，亲帝分裂分子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盗用西藏人民的名义，得到两司曹支持后成立“人民会议”。即使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反对协议、策划骚乱的事件和1959年3月以前出现的多次局部叛乱，毛泽东都坚持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对支持伪人民会议的个别头子只是敦促达赖喇嘛撤销其职务，对局部叛乱也只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去处理。

进藏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仅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搞阶级教育，甚至象《白毛女》这样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的电影在西藏都是禁止放映的。在从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中，中共西藏工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僧俗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执行《十七条协议》而斗争；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好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藏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藏和平解放后，

^① 阴法唐. 毛泽东同志和西藏的革命与建设. 民族魂网站, 2006年8月

设法排除原有统治阶级的干扰，救济扶助贫困的农牧民稳定发展生产。1952年5月，进藏部队首次发放无息农贷30亿元（旧币）。到1958年，共发放贷款折合银元270多万块。其中，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定对1950年以前各宗历年积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无息贷种和贷款。到50年代初，全西藏尚无一条正规的公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中央投资2.6亿多元（新币）巨资，动员数万进藏部队进行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成康藏、青藏公路。^①

1956年，随着内地各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中共西藏工委的一些领导产生了急躁情绪，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觉后，并明确规定从1957年起，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之后是否改革，要看那时的情况再定。^②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人员、机构、财政大精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共有上层人物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以上205人，五品以下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2613人，尚有3400人计划在1960年前全部予以安排。“六年不改”本是放慢改革和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让步，但西藏统治阶级却认为解放军软弱可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而这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

^① 陈崇凯. 简论中央与全国对西藏社会发展的扶持政策.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77（1）

^② 胡岩. 社会主义在西藏四十年. 西藏党校，1999（4）

1957年12月公布自治区筹委会《关于重判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杰平措的决定》、《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人役税的决定》，规定凡是当了国家机关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农奴主阶级占有农奴人身的奴役制度被冲破了一个缺口。^①这些都已经动摇了原有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对农奴主提出了尖锐挑战。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土改）引发了血腥反叛，西康叛军进入拉萨。叛乱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成立“西藏独立国”。驻藏部队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

三、社会主义建设

按照中央“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民主改革进展迅速，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将280多万克耕地分给了20万户无地的农奴和奴隶，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百万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在农区土地“谁种谁收”，在牧区牲畜“谁放牧归谁”；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牧区对未判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团结面更宽，打击面更小。根据民主改革时的调查和核实，全区贵族、大头人共634户，参加叛乱的462户，未叛的172户；全区大小寺庙2676座，参加叛乱的1436座，未叛的1190座；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全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未参加叛乱的2800户，占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总数的70%。未参叛者都是赎买对象。全区赎买土地共90多万克，占全区耕地点数的32%；牲畜824万头，占

^① 郭冠忠. 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 西藏研究, 1998 (2)

29%；房屋 6.42 万间，农具 2 万套。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约占总三分之一左右，价值 6000 万元。^①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 13 年付清。

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典型代表，许多寺庙的反动上层就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首先清查叛乱分子，其次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然后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爲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民改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寺庙失去了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不能干涉教育、司法，失去了全部庄园、农奴和政府中的显赫地位。寺庙只保留 553 个，僧尼只保留约 7000 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入来源一是靠赎买金维持正常活动，二是老弱病残和念经的僧侣按月从政府领粮油，三是有生产能力的僧侣参加农牧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为寺庙开垦出荒地和牧场，自食其力。^②

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那就不能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③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 1952 年，仅有随军进藏的民族干部二百人，占当时干

^① 洛桑丹珍，赤来。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党的统一战线。西藏研究，1995（3）

^② 吴云岑。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和对策——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1，22（2）

^③ 毛选五卷，不要四面出击，1950 年 6 月 6 日

部总数的 8%；1959 年民主改革时，民族干部发展到 2700 多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 30%；1965 年自治区成立时，民族干部发展到 17000 多人，占当时全区干部总数的 33.3%；1973 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占 35.2%，1975 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占 23%。根据《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日记》，如八、侧那、羊洛等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为基层干部，领导村民开展农牧业生产、组织互助组，并配合工作队围剿叛匪。依靠这些翻身农奴干部，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作成绩。在 59 年底，征购公粮和余粮的任务较重，县委传达日南部落必须完成 4600 斤的征购任务（除去已完成的赔罚粮 2000 斤外，还差 2600 斤），工作组的同志都觉得完不成。经过调查摸底以后，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很多按照政策应予免征的贫苦农牧民都自动要求缴纳公粮，连缺粮的农牧民也主动要求交纳粮食。在讨论卖余粮时，工作组估计只能卖 50 斤的，他们说，可以卖 70-100 斤；工作组认为没有余粮可卖的，他们说，有。最后完成了 2830 斤的征购公、余粮的任务，比上级布置的任务超额 230 斤。^①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稳定发展**”的方针，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从 1961-1965 年“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搞人民公社。”从 1964 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到 1966 年底，已在全区试办了 150 余个人民公社。1970 年底，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当年全区就建立起 1000 余个人民公社。至 1975 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 2000 个乡中，先后建立了 1921 个人民公社。1975-1976 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

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藏独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甚至被达赖称为“再叛”的 69 年武装反抗也同藏独有着实质的不同。参与 50 年代叛乱的底层群众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 1969 年叛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

^① 汝其. 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日记. 天涯, 2005（1）

^② 胡岩. 社会主义在西藏四十年. 西藏党校, 1999（4）

社。不仅如此，达赖失去了宣传藏独的途径，藏传佛教也在人们头脑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农奴充满解放的喜悦，还有谁一定要依靠宗教呢？群众既不到寺庙朝拜，也不为僧尼布施，群众与僧侣处于平等状态。在很多贫苦农奴看来，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们敢于去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而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①

同时，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的筹码作用降低。1972年美国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绝达赖访美；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并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达赖只能哀叹：“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自此，达赖穷途末路，开始试探我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将返回祖国。

四、胡耀邦“落实政策”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接受美联社采访，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在1979年年初，邓在北京见了嘉乐顿珠，指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

“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并表示“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嘉乐顿珠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联络；二是照顾十世班禅；三是在印度流亡二十多年时间里，达赖喇嘛办了很多的学校，培育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希望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邓全部答应：“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

^① 王力雄.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1998

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并问达赖可以派多少人过来，嘉乐顿珠表示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邓小平还劝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邓小平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邓小平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①

达赖喇嘛 1979 年到 1980 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农奴主们的哭诉，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李菊生，李向胡耀邦作了汇报。以此为基础，1980 年 3 月 14 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 31 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胡耀邦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西藏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二十九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四十五个亿。可是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五千九百万。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

^① 网文。邓小平的汉藏融合政策为何无以为继？

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考虑一个根本的方针，就是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包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就讲：“应当肯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这几年的西藏工作，总起来说是有成绩的，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工作，是出了力的。那么，请同志们来干什么呢？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了一些对西藏工作的反映和意见。有党内同志提的，也有党外同志提的，有在北京的同志提的，也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提的。其中有些意见，可能过分一点，但是我们书记处几位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许多意见都很值得重视，值得中央重视，也值得你们重视。听说有些意见你们也知道，但是不大赞成，或者感到委屈，甚至有些同志有点气愤——怎么把西藏工作说的一无是处啊！最近还有些传闻，说中央对西藏打算如何如何。这纯属妄测，没有那回事。但是，既然有不少反映，又有种种想法，那就索性请你们来，当面座谈一下。或者说，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一起，把西藏的情况，把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再深入研究一下。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就是对西藏的情况和工作问题，来一次‘再认识’。”“中央对于西藏，原来是有个基本认识的，从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到今天负责中央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对西藏是有个基本认识的，虽然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你们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应当比我们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些，你们长期在那里工作嘛！在‘庐山’里面，真面目是不是认识到了，是不是认识完全了，深刻了？或者认识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怎样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西藏？这就是请你们来座谈的主要的意思。”“在我看来，你们是不是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一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想得不那么够呀？我看你们无非是‘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脑子里总有这么一个阴影。这样一来，首先就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

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不联系相关的条件，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是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那么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呢？胡耀邦说：“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即：第一，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胡问大家，平时你们对这方面，是主动积极去开展工作，还是消极被动的呢？他说：“在西藏，如果你们不能积极热情开展工作，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所以，你们对统战工作的兴趣，一定要加强。”“我们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总是有很多差异的。但一定要注意，多找共同点，突出共同点；而不要突出差异点，突出分歧点。要看到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是爱国的，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二是想把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耀邦同志问大家，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如果不认真保护和发扬西藏固有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西藏的文化建设就没有根基，就会丧失其自己应有的特色。”胡耀邦特别强调，要大家注意：“决不能忽视甚至抹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因此希望西藏的同志，对于西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东西，一定要尊重、保护，并且认真扶植。”^①综合会上发言，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

^① 陈维仁（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与西藏。2000年10月

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早在邓接见嘉乐顿珠后很短时间内，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 376 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耀邦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 802 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①。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 1976 年至 1988 年，共安排 2100 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 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邓、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早在 1979 年 8 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受到藏民热烈欢迎。到拉萨以后，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后面的两个参观团再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邓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提醒藏人，为什么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而宗教参观团利用访问机会，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

^① 据 1988 年统计退赔财物：各种原物 37704 件，铜佛法器 37 万多公斤，林卡 72 个，土地 702 克，房屋 779 间，落实赎买金 492 余万元，寺庙财物折款 85 万元。

起极大轰动。^①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 70 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②

胡耀邦说汉干进藏 30 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 80%。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 5、6 亿元，80% 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胡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 5、6 亿元钱，80% 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 80% 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胡抓住这点对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进行批判，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③对于调出干部，当时阻力很大。胡耀邦的说法是：“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藏共有干部 5.5 万，其中汉族干部 3.1 万，准备内调 2.1 万；有工人 8 万多，其中汉族工人 4 万多，准备内调 2.5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 9.2 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得西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1980 年到 1985 年，5 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减少了 42%，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 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 12.2 万人，到 85 年仅剩 7.1 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 7 万人。^④

“老西藏”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勇于奉献。^⑤老西藏和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入党的翻身农奴干部对毛主席有着特殊的感情，反感胡否定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老西藏”的代表阴法唐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九章 “拨乱反正”. 1、怀柔政策的由来

^② 中新网. 90 年代以前达赖的分裂活动

^③ 邓力群. 1980 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④ 李国平，李恒炜. 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安全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7，28（1）

^⑤ 魏碧海. 一种精神穿越喜马拉雅——“老西藏”阴法唐访谈录. 军事历史，2006，148（7）

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他们联合抵制邓、胡的政策，在阴法唐主政期间（80-84），胡的宗教、统战政策难以贯彻下去。借“清污”运动，1983年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涣散、放任自流倾向。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这些反映了实际情况的报告受到了胡耀邦的批评，1980年1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①

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反“左”。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穿上藏袍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据调查，1982年全区宗教活动场所64座，僧尼1288人；1987年宗教场所928座，僧尼14320人；1990年1353座，僧尼42190人；1994年1787座，僧尼46380人。这些数字只是在编僧尼，还不包括社会宗教人员，根据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九章 “拨乱反正”. 2. 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某县 1992 年调查，社会宗教人员为在寺僧尼人数的 27.7%。^①僧侣是贯彻达赖意图的中坚力量。一度被藏人骂为“藏奸”、最终帮助达赖抢先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的话集中体现了僧侣的意识：“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②寺院中年轻僧尼比例很大，据保守统计，大中型寺院中年轻僧尼占寺院僧尼总数的 85% 以上，各中小寺院基本上是 50 岁以下的青壮年僧尼。按 680 个乡镇计算，1994 年平均每个乡镇 2.5 个宗教活动场所。现在全国 3500 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僧尼 13 万人，活佛约 1700 人。在对过去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的诱惑下，寺庙势力尤其青壮年僧尼成为藏独的急先锋。从 80 年代下半期以来，包括达赖 1987-1989 连续在拉萨街头策划、煽动、组织的多起分裂事件、1994 年“和平挺进”行动、2000 年 7 月 25 日存旦加措大昭寺广场自焚阴谋、2001 年 8 月 19 日拉萨市哲蚌寺展佛节悬挂“雪山狮子旗”等事件，其主要作案人员均为青壮年僧侣。据统计，自 1987 年到 1996 年，在策划骚乱、闹事、帖反标、散发反动宣传品等上百起反革命事件中，绝大多数是由境外达赖集团怂恿寺庙参与的，参与人中僧尼占 71%，而青年僧尼又占了大多数，他们充当骚乱、闹事、游行的主力。^③

对于宗教的作用，达赖认识非常清楚。达赖说过：“**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一个寺，等于控制一个地区。**”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曾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公开宣传：“**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西藏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西藏自治，再过 20 年后，在大西藏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达赖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藏僧穿酱红色僧袍），利用胡耀

^① 吴云岑. 关于西藏农牧区社会宗教人员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67（3）

^② 王力雄. 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 2000 年 5 月

^③ 德吉白珍. 积极引导信教青年投入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西藏党校，1997（1）

邦、伍精华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某位流亡活佛衣锦还乡，乘着伍精华等人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鼓动说：“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还有一位流亡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 40 多座寺庙 80 多个活佛，1600 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喇嘛书记”伍精华对这些人却大加欢迎，将流亡活佛奉为上宾，无异于养虎遗患。于是对同一事件出现两种表述：（1）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2）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①

五、西藏问题的未来

1988 年 6 月，乔石在西藏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当年 8 月下旬起自治区党委派出九个工作组共 181 人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在经历 1989 年 3 月的骚乱之后，10 月 19 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1994 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同志理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章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在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996年，陈奎元主动出击，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以三大寺为首的各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此后一段时期内，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和爆炸事件暂时绝迹。^①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过了几年分裂势力又卷土重来。据统计，达赖不断派遣人员入境、散发宣传品，2002年发生散发反动标语悬挂“雪山狮子旗”、弹唱反动歌曲、呼喊反动口号的案件比上一年上升了21%；鼓动不明真相群众出境，朝拜达赖当僧尼；创办“一免三包”学校争夺青少年阵地；利用讲经、念经争夺僧尼、群众，一些群众崇拜达赖，家里悬挂达赖图像或像章。^②2007-2008年，分裂势力更是利用奥运会的时机，再次兴风作浪。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首先，在宗教政策上，寺庙仍在膨胀，僧侣的优越地位没有改变，追随达赖的分裂势力基础仍然存在。联产承包之后，随着收入提高，农牧民把相当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宗教消费上。1988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一章 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② 毛欣娟. “严打”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3, 103 (3)

年调查表明，拉萨寺庙喇嘛每人每年平均得到布施 1000~1300 元。这种行为对生产、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却为寺庙经济提供坚实基础。以色拉寺为例，1984 年总收入 27.10 万元，均为劳动所得，包括果园收入、泥塑收入、运输收入、牧业收入等；1992 年总收入 86 万元，其中布施收入 40 万元；1999 年总收入 454.37 万元，其中生产经营收入 116.75 万元，旅游收入 79.47 万元，佛事收入 242 万元。^①一些农牧民送自己不满 18 岁的子女入寺院，大量青年成为脱离生产的僧尼，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牧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广大农牧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又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精神寄托的盲目性，形成恶性循环。以索县荣布热登寺为例，寺庙所在的荣布、色昌两乡属半农半牧乡，生产极为落后，粮食亩产只有 100 多斤，每户只有几头牲畜，副业主要靠挖虫草，效益好时虫草收入占两乡每年收入的近一半。1997 年荣布乡农牧民人均收入 492 元，色昌乡人均收入 585 元。而 54 户佛事基金户主一次性向寺庙捐献物资青稞、麦子、酥油等实物与现金合计 118 万元，平均每户 2.18 万元。佛事基金按照 20% 利润增值，每年寺庙增值 23.6 万元。1997 年宝瓶祈愿仪式活动，寺庙给老僧每人分 5000 元，总管室每人分 6000 元，其他僧人也有相应红包。据调查基层农牧民约有 70% 信仰宗教，群众宗教消费投入不断增加并进行相互攀比，社会生产萎缩，寺庙已经成为农牧民的沉重负担——贫穷是宗教的根源，然而寺庙香火越旺，佛像越庄严，当地越贫穷——这就是世人视为独特风景的“西藏文化”。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解放前就挥霍、耗尽藏人血汗的寺庙^②再次成为农牧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

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

^① 大笔的“香火钱”都用在了维修佛像和大兴寺庙土木上，“慈悲的佛祖”只将牙缝里的一点点奉献给需要“普渡”的众生——1999 年色拉寺为社会扶贫捐款 3000 元，希望工程捐款 500 元，占总收入不足 0.1%。

^② 达赖时期的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 92% 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用于形式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

益群体”。根据有关资料，1988年西藏自治区人大选举时，藏族代表在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中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0%以上。^①1998年，西藏的68000余人的干部队伍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52000余人，占西藏全区干部总数的将近75%。目前，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均由藏族干部出任，全区900多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亦由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担任。^②其中高级藏干很多出身贵族家庭，同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根据既定的抑汉优藏政策，又很难触动其根基。根据《阴谋与虔诚》一书记载，西藏文化厅厅长强巴平措在“地专班子调整”时，被揭发有三大问题：一是把文化厅的女演员当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动员德国文化机构邀请他访问德国。结果只是将他平级调任实权较小的西藏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几乎起不了作用，陈奎元也只能靠收缴达赖相片、写保证书等充门面。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贪污腐化也好，即便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仍阴魂不散。^③

再次，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首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农牧民阶层，有90万人，目前面临着生活环境差、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等问题；其次是工人阶层，2001年国企职工5.1万人，西藏的工业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大都设备陈旧，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由于企业不景气呈下降趋势；再次是城乡贫困阶层，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区共有贫困人口13万多，其中城镇贫困人口5万多，农村贫困人口7万多。^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其中劳资和部门间、城乡间、低收入阶层和新富裕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城乡收入差距为1.8:1，但到2004年已扩大到4.18:1，几年来西藏

^① 车明怀. 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跃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西藏研究, 1999(3)

^② 陶长松. 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西藏研究, 1999(3)

^③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 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一章 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④ 普布次仁. 关于当前西藏社会各阶层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 西藏研究, 2002(3)

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都达到 0.4 以上。^①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90 年约 2.8: 1，到了 1995 年达到 4.56: 1，2000 年则为 4.84: 1，2001 年 5.07: 1，2002 年则达到 5.6: 1。^②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造就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口，西藏 67% 的非农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保险，失业、疾病问题严重。拉萨城关区居委会辖区，因经济收入不平衡和社会不公，导致穷人和富人不来往，穷人仇视富人。阶级关系是民族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拉萨鲁固社区，尽管有工作机会，但是一些待业青年不愿就业，贫富分化强化民族差异；假冒伪劣商品已经在西藏找到市场，当地藏族群众认为假货都是内地汉人和回族制造的，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③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 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 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 89 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

^① 西藏统计年鉴，2006

^② 张恒绪. 增加农牧民收入是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西藏发展论坛，2003（6）

^③ 杜永彬. 关于西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调查与研究. 中国藏学，2007，78

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①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由公路、铁路、航空形成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92%的乡镇和72%的行政村通公路，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85%。目前，招商引资的大幕已经拉开，西藏也将进一步的“世俗化”，“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不可能存在”^②。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加剧了西藏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未来一段时期内，青壮年劳动力将大量向城市转移，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矛盾仍将继续激化，目前就已经出现了集体上访快速增加的现象^③。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可以预见，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可能激化，分裂势力可以利用的机会更多。《激流中国》第六集“圣地寻富”就记录了一个农牧民青年曲列外出打工的经历，这个藏族青年刚来拉萨，在四川老板张晓宏开的“西藏雅鲁藏布大酒店”里面打工，表演民族歌舞，每月收入1300多元。后来资本家开始降低劳动成本，实施“能力工资制”，包括曲列在内的15个藏族青年都被划为C级（劳动技能不足），工资降为原来的一半，只有763元。被扣工资的一个藏族小姑娘同汉族管理者发生尖锐冲突，曲列则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辞职了之。这件事本身是阶级矛盾，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但长期以来，分裂势力却将类似事情（包括鲁固社区的贫富分化、汉回商店里面的假冒产品等）歪曲为汉族对藏族的歧视，这样阶级矛盾就转化为民族矛盾。

今后矛盾如何发展，我们无法预料，但总结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藏独势力本身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坐大的，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藏独问题。正如马恩所讲：“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

^① 王力雄.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1998

^② 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③ 周松青，舒敏勤. 正确认识西藏社会矛盾努力构建和谐西藏——新时期西藏社会矛盾分析. 西藏大学学报，2007，22

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① 共产党宣言，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80 年代的群众运动

对于80年代的群众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左派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当及早清理整顿；有的右派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体现，应当予以颂扬。针对左右种种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取何种观点，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本文从两种群众观的视角，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分析。

一、两种群众观

毛泽东始终相信并重视群众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①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高度重视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②革命战争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和平年代，“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④不仅如此，毛泽东始终倡导、坚持和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作为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武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作

^① 毛选三卷，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② 毛选二卷，论持久战，抗日的政治动员，1938年5月

^③ 毛选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④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07-14

用，毛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①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只有利用群众运动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对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毛泽东并不推崇，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识，增强团结，才能克服群众运动这一弊端。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集体无序性，从而引导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和个人主义，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来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持下，面临着罕见的、艰难的自然条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如期修建完成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创造了人间奇迹。^②

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和基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由于各级党团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少数“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到可乘之机，利用文革的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同卡博、巴卢库的一段谈话，1967年2月8日

^② 刘晋萍．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的基本特点．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1（1）

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①文革后当权派坚决抛弃了群众运动的做法。邓小平在1980年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②

“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③。

那么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治腐败问题呢？改革派认为其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是滋生官僚主义和集权现象的历史根源，主要靠加强“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④邓解决官僚主义和特权化的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⑤“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⑥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廉政建设的同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① 邓小平文选一卷，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

^② 邓小平文选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③ 邓小平文选二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④ 邓小平文选二卷，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

^⑤ 邓小平文选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⑥ 邓小平文选二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

强调法制化的同时，群众监督被架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①；同时，群众对党组织不再有监督的权力，“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②，监督体系中第一位的是“党的监督”，第二位是“群众的监督”，第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③。改革派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社会主义“民主”是服从于“秩序”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④。

69年“大联合”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各类群众组织被整合、撤销。文革后期，老干部复出，旧有秩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组织和民主体力被进一步否定。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在人大常委会们一边倒的赞同声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理由是“四大”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1982年修订《宪法》，正式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法制秩序，加强对群众的纪律教育。

二、胡耀邦对几次学潮的处理

《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由于刊登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等问题，遭到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查禁。汪东兴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一排矮墙上，成

^① 邓小平文选二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② 邓小平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 邓小平文选一卷，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

^④ 邓小平文选二卷，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

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自此，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青年还自发地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形成了“西单民主墙”现象。1979年3月，任晓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后，引起当权派的不满。魏京生公然宣扬党中央是一个政治骗子大集团，还鼓动外地上访人员到新华门请愿，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每次活动都给美国总统写信。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邓就借故逮捕了魏京生。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胡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事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了想法，胡耀邦表示赞同，并在月坛公园进行试点。

胡耀邦等人的“民主观”同老左派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胡认为“四大”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

限上纲等手法，煽动无知的群众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这一点，在当权派中，无论左、中、右，都是毫无异议的。但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胡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邓、老左派等人坚决反对。例如对于言论自由，胡等人认为不应取消，例如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当允许在单位内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园”内张贴。而邓、老左派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决取缔。邓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〇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①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日贸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对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引发“九·一八”学潮。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此后，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

^① 邓小平文选三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

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胡耀邦提出“对话”的方针，要求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自70年代后期起，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中逐渐泛滥。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宣传马列主义过时。1985年12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三个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结为《资本论》，又把《资本论》归结为批判经济学，提出要从批判经济学转到建设经济学。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认为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秦柳方上书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在官方的鼓励和纵容下，80年代中后期以后，“洋教条”兴起，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出版物、讲坛或论坛、研究机构等开始大范围传播，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成为大学校园中新的时尚。改革开放本身以政治冷淡主义为导向，鼓励关注个人与“自我”，西方各类政治学说正迎合了这一点，将精英思想灌输给积极关注政治的学生，由此形成80年代群众运动的特殊性，即历次学潮的领导者大都是由自由派分子领导的。在“九一八”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少数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增强了保守派的担忧和疑虑。邓小平在学潮期间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

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①

学潮平息以后，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4月12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政策；4月22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同时，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组织召开大文化战略讨论会，武汉也组织类似讨论会。在“三宽”方针下，各种自由化观点出笼，宣扬其他学说应当同和平竞争、百家争鸣。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②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③7月12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

^① 邓小平文选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60页

^③ 邓小平文选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64页

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雅鲁泽尔斯基、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谈话等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个大升级，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出来了。90年代以来有些人提出的东西，其实并不新，86年前后都能找到。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986年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潮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86年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月1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12月5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北京在12月10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为了制止游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12月29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 and 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在上海，12月19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7时15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8时到12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800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5时45分，公安机关组织2000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22日到23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12月5日和9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此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①

大范围学潮引起保守派的恐慌，12月30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

^①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章 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年

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处理。”^①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学潮态度坚决起来，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題，保守派对此严重不满。李瑞环回顾1979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不坚决，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王震和陈丕显到天津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王震说：“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12月31日，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

胡耀邦对学生手软，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12月30日邓小平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②1987年1月10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批判胡耀邦。1月10日，胡耀邦作了检查，并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公报，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94-1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94-195页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先后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终于平息。

三、赵同老左派的矛盾

邓对胡耀邦不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1985年，邓小平让乔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赵紫阳同胡耀邦有所不同。赵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赵紫阳并不反对，六四以前很多人都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赢得了老左派的信任，最终当选总书记。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的谈话：“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民间这样描述：“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1月28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朱厚泽；1月底，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局，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管制。

胡耀邦辞职后，老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让赵紫阳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5月13日，赵在会上发言：“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这次讲话刹住了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此后，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力大大缩小。紧接着，10月召开十三大，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老百姓看清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突破了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①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央

^①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落马

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价格闯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汇率都是双轨的。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价格闯关还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

在社会不满增加的情况下，自由化分子空前活跃起来，指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自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方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12月7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1989年，自由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起、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

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在这样的气候下，青年思想受到相当大的影响，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采，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四、八九运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4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提出七点要求：第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1987年1月对胡的批评）；第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第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第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第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后来提出要与李鹏对话。有工作人员出来接受了请愿书，但没有人对话。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一些人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北大的大字报上，有人提出“唤起工人大哥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明确目标，不要四面出击”，核心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自由，要民主”。20日新华门清场，100多名学生被强行带上公车。21日吾尔开希等提出罢课主张，要废除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权力，各校相继出现一些临时的学生组织。25日，有些学校出现占领校广播站的事情，这天成立了“高校临时委员会”。

4月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即“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

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同一天，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召开《民主的困惑》讨论会，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为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1976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1976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自由派头面人物纷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到各大学演讲，鼓吹“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4·26”社论发表后发上引发强烈反弹，学生游行，要求撤销社论，认为不是“动乱”。各校纷纷集会、抗议，都贴出大字报，其中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4月27日，几万学生游行，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游行时也改变了策略，攻击、谩骂不见了，换之以“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等。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与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座谈，但双方在社论的结论上互不相让，王丹等人不承认这次对话。

5月3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讲话，学生反应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5月4日，游行的学生由4.27的3万多下降到不足2万，口号有“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游行结束，很多人开始对运动厌倦，打算复课。当天下午，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讲到：“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

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随后这个讲话在电视上播了三天。学生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李先念听了“亚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亚行讲话”。5月8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第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第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第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第五，司法独立；第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后经过删改，5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以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形式发表。

5月6日，23所高校的学生签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5月8日下午3时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在学潮渐息的情况下，有人出新招：绝食。目的有：第一，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第二，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第三，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3日，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

量，请支持我们！”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三千多人。从5月初开始，报纸、电视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500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等。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打着写着这些机关名称的巨幅横标，特别引人注目。如海关总署的大横标写着“官倒走私 铁证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其他口号还有：“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白猫抓权 黑猫抓钱—35中教师”“官倒不倒，人民不饶”“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中国专利营养秘方：50少年，60青年，70中年，80正当年—中国专利局”等。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赵对戈氏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此后，游行中攻击邓小平的横幅增多，例如“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等口号。5月17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到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5月18日，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有几百名被送往医院。北京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产业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超过了50万。5月19日，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上看望学生，李鹏讲：“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天安门出现署名为“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的传单，称“要中央接受绝食学生得来那两条要求，否则24小时全市工人罢工。”

矛盾越来越激化，邓小平决定出动军队，19日晚上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市民自发去堵截军队，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群众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还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当晚广场上，“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队伍排列整齐开进了广场。5月21日，高自联对“是否撤离天安门”进行投票，主张撤离的占多数。但由于幕后人物的干预，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5月22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出现在广场上。5月23-25日，游行继续，口号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5月25日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播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5月26日，北京学生大部分撤离广场，把地方留给外地的进京学生。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的来的少。当天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

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①5月29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广场上出现了香港“捐送”的帐篷和民主女神像。5月30日，“筹委会”广播站称，公安部门抓了“工自联”一名负责人，于是北大约200人去游行，但响应者寥寥。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一、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二、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四、加强舆论导向；五、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126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6月2日，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到广场上搞第二轮的绝食，吸引来上万人围观。

6月3日晚，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市政府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当晚，部队向市区开进。11时，部队接到命令可以鸣枪示警，强行开进。有的地方还释放了催泪弹。6月4日凌晨4：30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5：30结束，清场中开枪是为了打掉指挥部的喇叭，期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6月6日，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近300。6月8日，北京已经平静，部队开始清除路障，打扫垃圾。^②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认为“4·26”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邓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暴乱，

^①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十七“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②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也是必然的。”^①6月23日到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职务。

五、基本结论

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关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工人的六月起义时写道：“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②

改革开放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同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相似，他们高呼“法制”的口号，取消了大民主，反对群众自我组织，实行物质刺激与政治冷淡主义，拱手将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政治热情送给了自由派。

学生运动本身并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1956年石家庄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组织示威游行，甚至打出了“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反动口号。在70个学生代表中赞同反党口号的只有十几个，另外五十几个人反对；在四千学生里头，大部分都不赞成。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学生的主体是拥护共产党、赞同社会主义的。正如毛所说：“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③八九运动也是如此，尽管一小部分学生领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但学生运动的要求与少数自由化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02页

^② 马恩选集1卷，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1848年的六月失败

^③ 毛选5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子的要求截然不同。从“4·18”伊始，学生提出的要求就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求民主体制，这些权力要求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大多属于大民主的范围。其中“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现在反而再次成了左派的口号。“4·26”以后，学生运动方向更加明确，变为反腐败、反官倒，也提出了拥护共产党的鲜明口号，但此时当权派坚持“4·26”立场不变，使赵紫阳等投机分子捞足了政治资本。“5·13”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其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并没有影响运动的主导方向，随着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的广泛参与，运动的对象鲜明的指向了官僚主义者和特权阶级，群众要求惩治官倒、要求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5·19”宣布戒严以后，北京的市民空前动员起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阻滞军队长达半月时间，而此时学生运动已经逐渐步入低潮，工农群众成为运动主体。如果这一运动不被镇压，可以想象，运动目标都会更多地体现普通工农群众的要求，其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毛早就指出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大民主”对付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付的是阶级敌人，“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①而群众的觉醒与组织，正是特权者所害怕的。从改革派的角度看，“稳定压倒一切”，当底层群众从5月开始广泛参与运动时，邓就下定决心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80年代的老左派也是秩序派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并不包括群众运动，因此他们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并不是诉诸于群众运动，而是“清君侧”。他们亲自树立起邓的权威，抓住邓为了社会稳定的只言片语，打击忠实执行邓路线的胡、赵

^① 毛选5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集团。胡乔木等人更是千方百计把打击政敌的话写进邓小平的讲稿，以此获得最高权威。其效果可想而知，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插手农村雇工问题被邓制止，“第二次拨乱反正”更是中途夭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掷地有声地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在89以后，老左派继续延续这一方式，为领导人讲话做注脚，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一把手左转，其结果也必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老左派可以在86学潮将胡拉下马，可以借89运动除掉赵，但却改变不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路线，扭转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他们反自由化的方式就是加强治理整顿，对群众施加法制和秩序，但这正塑造了瓦解社会主义的基础。既然在八九以后，对工农群众的管制更多，群众更无力反抗官僚主义者的统治，那为什么特权阶级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变成可以传给子孙的财富呢？

如果毛主席来处理八九运动，毫无疑问，毛不会因为自由化的原因镇压群众。毛认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决定力量……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标志。”毛始终主张“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毛还旗帜鲜明地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毛将站在底层群众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会支持群众的热情和创造，并随时了解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对运动方针、政策的反映，马上“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专会”，传达正确的精神和说明运动的目的，“利用电影、幻灯、戏剧、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②对于少数自由化分子领导运动的情况，毛一定会提倡学生同工农相结合，“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1968年5月11日

^② 毛选五卷，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

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反官倒、反腐败的运动，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扭转精英控制的运动方向。

对于群众自发的斗争形式和自觉的革命行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来源于千百万群众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①

第二，关于运动的后果。八九运动对中国社会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对资产阶级。方励之曾经呼唤企业家“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而新成长的私有资本在八九中也曾试图问鼎政治。但经过八九的教训，他们清晰的看到了政权的力量，在特权者的卵翼之下才有发财致富的良好环境，因此通过资本家入党和书记变资本家，资产阶级以体制内的身份发展起来，并继承了压制劳工的政治遗产。八九之前的自由化分子，也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改革设计者。其次对国企工人。80年代国企工人尚未受到明显的伤害，他们并不理解学生运动的目标和口号。八九之后的整顿，形式上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力量的一次尝试，它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工人如果想捍卫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各项权力和福利，体制内已经没有出路。八九运动使青年学生远离政治、走向实用主义，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对此已经淡忘；但国企改制却使工人继承了八九运动的记忆，甚至自由、民主等思潮也在国企工人中获得一定市场。八九运动中，工人可以借学生的民主运动参加运动；但九十年代以后，工人只有依靠自己。

^①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

城市传统工人地位和作用

——就《安源实录》对若干错误认识的批判

对于传统工人阶级，应怎样看待其社会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不仅在左右派之间，即便是左派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传统工人是和社会主义制度同呼吸共命运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工人也被掩埋到社会最底层。右派们鼓吹“告别革命”，资产阶级学者于建嵘等人说：看看你们的现状，你们的悲惨命运都是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这个社会本是由精英来统治的，工人无法管理生产资料，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毛时代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是政治精英恩赐的，这种权利既可以赐予也可以剥夺，所以你们现在就失去那些权利了。你们的所谓阶级意识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强加给你们，你们与共产党之间关系是很脆弱的，你们只是被政治精英利用罢了，“领导阶级”的词汇使你们成了“迷失的阶级”。所以工人必须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现在该做的是去积极争取独立工会，摆脱共产党。你们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选票来表达，不能去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工会组织起来，与资本家“合法”的博弈，你们的要求只该限于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利益，这才是工人阶级本来该有的“阶级意识”。^①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老工人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已被割断了与资本联系，通过落实社会救助就可以解决。而资产阶级的认识还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是没有幻想的，从砸“三铁”到三年攻坚，从“一长制”到产权改革，他们旗帜鲜明的将传统工人作为敌人来打击的，不瓦解传统工人的抵制，他们就无法攻破“计划经济的堡垒”，就无法顺利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形势，我们现在的一些左派根本不了解，也没有深入做调查，还不及于建嵘。除了嘴上将马列作为圣经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根本不了解现实，也不愿意去了解，只看到一些工人的表面现象并寄予同情。远离现实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① 于建嵘.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威虎网

工人阶级先进性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也认为工人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很多人尽管成为左派但仍然是精英，骨子里并不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要忙着构建新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

按照就业企业性质、岗位劳动关系，可以把城市传统工人大致分为四类：（1）垄断企业中的工人；（2）成功改制后继续留在企业中的工人；（3）下岗买断工人；（4）退休工人。在西方退休工人离开大生产，属于社会人员，接受养老金，一般而言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的有特殊性，这是其历史渊源决定的。

垄断企业工人的工作岗位有保障，不出大错就不会失业，在工人中收入还算较高。目前他们的福利状况呈下降趋势，政府不断在讲“垄断企业工人工资太高”压低他们的工资，同时劳动强度也逐渐加大。改制后还在企业上班的工人收入不多，干一天工作有一天工资，劳动即有工资收入，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基本建立起来，买断后实行合同制，工作岗位不是很稳定。前些年没有罢工现象，与第一类工人相比，近几年罢工现象增多。这类企业还有一个特点，新老工人混合，新工人主要是工人子弟和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江浙一带。这部分应该是新工人中比较先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和老工人融合在一起。第三类工人数量最大，包括各种形式下岗、内退和买断的工人。第三类和第四类工人是整个工人阶级中比较有组织性的。将这四类工人对革命、历史的态度上做比较，对文革和对文革理论的伟大意义的认可程度是依次增强的，这与今天利益受到的破坏和过去政治上的训练、社会主义教育很有关系。从阶级冲突等角度评价，垄断企业中矛盾比较轻，下岗工人所面对的矛盾最重，下岗工人的革命要求也是最强烈的。借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可以将这几类工人类比作富农、中农、贫雇农。第三四类工人的政治化程度水平在提高，文革时如果是灌输的话，现在是切实感受到了；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在同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敌人斗争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

老工人（即传统工人）的斗争特点非常鲜明。老工人只要有斗争，表面上争取经济利益，实质是政治化的，因为单纯的经济要求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上升为政治才能解决。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传统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是单纯的劳资矛

盾，老工人受到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压力，不是简单的与资本家冲突，更不是简单与警察冲突，而是与政权直接冲突^①。这种斗争是全国性的。

有人提出第三四类老工人的斗争只是对过去的回忆，是为了在统治阶级那争取一点残羹冷炙，这种斗争没有希望。他们认为工人斗争要有手段，而老工人没有生产机器，失去了对抗资产阶级的手段，就不能击中资产阶级要害。这种观点教条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原理，忽略了当前中国斗争的具体条件。今天老工人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搏斗，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是政治斗争。对比新工人，他们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属于工联主义范围。当然，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未来运动中老工人会对新工人产生更多的作用，新工人的斗争也不会简单重复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跟英国工联主义运动不同，下岗和退休工人不是跟厂长斗，而是在跟厂长背后的国家机器斗，是采用以中央压地方的策略来斗。政府不怎么害怕东南沿海私营企业的罢工，多数都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而且甚至还会看到媒体上报道这类斗争，因为他们不过还处于欧洲百年前的自发状态而已。老工人明白邓时代、毛时代的区别，能分清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们的意识普遍达到了这个程度^②，以老工人的这种政治意识，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欧洲工人经历 100 多年的斗争，整体上仍达不到这个水平。

经历了文革和 30 年复辟过程，历史教育了工人，他们也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文革时期，工人只是觉得毛说得对，但没有从本质上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队伍在文革时期的分裂就是一个例证。工人阶级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从根本上不认可毛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存在走资派；造反派无政府主义现象很严重，很多人想造反，却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一些人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造反，更加分裂了革命队伍^③。我接触的很

^① 燎原. 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

^②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四〇、纪念馆前的争论

^③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1974. 后记

多造反派领袖都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不重视工人，真正认识工人的不多，主动做工人工作的更少，一些人构造的所谓“文革理论”中好多是一种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来文革时期造反派内部的情况。他们看国企工人，只是“恨铁不成钢”，指责工人“怎么不革命，一天到晚都只搞经济斗争”等。

文革前，工人只能认识到资本家，却不能鉴别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最后在领袖逝世之后丧失了政权。“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真的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文革的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达到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现在不能达到的高度。

那么有人会问，老工人年龄都很大，再过 20 年他们死后这种意识是不是就消失了？不会消失的，工人后代和老工人之间有继承关系，有的是融合，有的是通过工人后代传播，未来这种影响作用是巨大的，老工人有可能使我们新工人的意识形态跨越一百年。我们的资产阶级不是也只用了三十年就跨越了欧洲资产阶级一百年的进程吗。很多人都认为老工人要退出历史舞台，小资认为他们的斗争是没有前途的。怎样来判断斗争的前途呢？不能教条化理解，比如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去推测，而要从历史进行比较分析。老工人几十年的斗争，教育也锻炼了他们自己，也阻止了资产阶级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私有化进程。今天共产党不脱红马甲与工人的斗争有关系，“中央是好的”其实也是工人自己斗争结果。02 年东北大工潮，阻击了全面下岗买断运动，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买断风潮受到遏制，统治阶级不得不变换其他方式；赢得了财政支持低保政策，朱镕基原来想给公务员第四次涨工资，结果没涨成，这笔钱用于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①。不仅如此，工人也受到了锻炼，其进步速度比左派知识分子快得多。现在流行搞串联，很多人跑到北京来找左派，我劝他们到自己当地的工厂里找。北京大部分的左派是保守左派、小资产阶级左派和机会主义左派。

有很多人担忧工人过不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关，我现在是比

^① 刘畅. 项怀诚：今年 7 月 1 日机关事业单位涨工资 城市居民低收入者等将增加补助[N]. 中国青年报，2003 年 03 月 07 日

较乐观的，如果资产阶级有一天要搞民主、搞多党制，不必太担忧。我们应该相信工人，他们不会简单的听从资产阶级给的民主形式，他们会将之落到实处。安源工人的这种职工代表组织^①，在国企工人斗争中普遍采用，很像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是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创建的，列宁对苏维埃给予高度评价，将其作为人民革命的代表机关^②，在1917年通过苏维埃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所以觉悟的工人要主动学习十月革命的历史，很多方面列宁都已给我们指出了前进方向。而职代会是中国工人自己创造的，在未来会发生巨大作用。对这一点要抱乐观态度。

小资左派否认老工人对未来革命的意义，很多人说要搞社会主义，却不知道依靠力量在哪里，就在老工人中。资产阶级明白，下岗工人是要跟他们算帐的，老工人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说“我们在跟时间赛跑”，想通过时间来解决，把老工人拖死。安源工人明确的讲：“国家有些改革措施肯定是不对的。像这样对待我们这些为国家贡献了青春年华的老职工就不对。我们这些人完全可以还在企业里干些事，现在一句话就叫我们在家呆着……这哪行啊！……这样的改革还是不要的好。这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看法，可那些当官的肯定不这样看。他们现在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屁股下面坐着小轿车，怀里抱着小妖精，富得流油，舒服得很啊。最可恨的是，这些人得了便宜还硬气，说我们这些工人下岗了，生活是苦了，但是没有办法啊，改革嘛，就得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啊。真是不要脸啊，为何不能牺牲他们这些当官的利益呢？为何改革就只有牺牲我们这些工人的利益呢？”^③“那些反铁饭碗的人，主要自己拿到了金饭碗。”^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工人的世界了。当官的腐败，做工的受欺压，还没有人能帮我们说话。”^⑤“现在工人不值钱。在毛泽东时代工人讲话算数，‘文化大革命’工人地位高。‘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是工人阶级讲

^①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第二部分 工人行动中的政治

^② 列宁选集1卷. 反对抵制. 1907年7月9日

^③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七、下岗失业工人的担忧

^④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八、矿医院

^⑤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二六、食堂里的愤怒

话算数……虽然‘文革’时我挨斗，……当时起码有四大自由，有意见我就可以写大字报，而现在却不行了。”^①……对这个复辟、被剥夺的过程，工人是清晰感知到的，而不是被灌输的，这是历史的过程。就像过去对农民说土地不是天然地主所有的，和真正进行一次土改革命后农民的政治意识，是不可比拟的。未来革命比土改要深刻得多。对于垄断工人、改制工人也是如此，随着矛盾的越来越激化，越被剥夺，他们也会起来斗争。他们现在不起来，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是目前资产阶级做了一定的让步，二是革命客观条件还不很成熟，所以他们比较保守。

有人提出，现在工人处于被动是因为没有有形组织，不能有效约束那些不参加斗争的工人，所以当务之急是成立工会等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形势不合适。这同今天的政治环境有关系，现在成立工会或类似组织，跟建党是一个难度。在××油田，下岗工人打算公开成立“下岗工人联谊会”，还没组织起来领头的就被抓进去了。对于组党、组建工会等问题，很多工人都认识清楚，他们说没必要，今天还不用这个方式，而且用了也起不到正面作用。在大多数工人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没必要用这种组织。他们现在采用的就是职工代表的方式。在毛时代的干部中，有很多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往往主动承担职工代表的职责^②。而地方政府在冲突过程中也要求工人派出代表，也半公开的承认职工代表。这种组织说合法也不合法，说不合法却合理。

有一些青年，他们也看到了老工人的重要性，因此提出要向老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灌输马克思主义”是列宁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指的是在那个时代工人无条件自己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工人天然也不能成长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能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阶级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后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通过科学的论证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经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更进一步的证明了“灌输”思想的正确性。在列宁时期，俄国的工人大多是小资产者的农民工，文化教育

^①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三二、矿工与“矿工”的对话

^②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五五、工人代表们

也很少，各种派别都在工人中争夺阵地，因此列宁当时提出“马列主义必须向工人灌输”，“工人自发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所以很多工作是要知识分子去做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不要简单提“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主要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老工人经历过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的训练，又经历这几十年复辟的教育，从《安源实录》的访谈中就可以看出不少工人觉悟很高。此外，这些工人的文化素质也不低，工人写的上访信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不比知识分子写的差。现在老工人中很多都已经觉悟，在同他们交流中，他们很明确表示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们也清楚我们帮不了什么忙，同几年前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状态完全不同，这也是水平高的表现。

那么左派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呢？到先进的工人中间，同他们一起研究历史和现实。现在老工人也存在局限性，例如信息不畅、地域限制等。同时，包括老工人在内，很多工人都受右派影响。很多左派连老工人都不管，一些人嘴上说新工人重要，但也不去做新工人的工作，都是在空谈。左派知识分子要去总结历史，到工人中去与他们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总结文革，而不是在某些造反派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总结经验然后推广之。按照毛主席所说，要先去做小学生。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生产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①。首先，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扩张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机器大生产应用更为广泛。

其次，商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商业资本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它虽然能增加生产资本的数量，缩短商品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过费，扩大国内外市场，但是，商业资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并积累了生产过剩^③，从而使危机更为剧烈。商业资本有三种职能：第一，“就是运输业（商品的转运）”；第二，“商品在真正作为商品存在以前，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必须按照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相适应的数量进行分配，分离。”第三，“一切投在商品库存上的资本”即保管和保藏商品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如果这些职能没有由于分工而被交给处在（工厂）外部的资本家去执行，那么，商品的库存和保藏就得由直接生产者去进行。”^④私营商业资本发展必须实现以上三种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资本生产与流通之间矛盾日渐突出。例如 1979～1980 年，江苏省养鸭大发展，可商业部门只收购很少一部分，一时出现了销售难；浙江省生猪大发展，猪调不出去，当地又缺少冷库，肉食公司只好发票限量收购，卖猪得抓阄抽签；青海省农民养鹿养兔发展很快，但商业部门不收购，因此 1981 年农民饲养者减

^① 资本论一卷，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2、流通手段

^② 资本论一卷，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③ 例如 1994 年轻工业品，工厂库存 2247 亿元，商业部门库存 6101 亿元，工商库存总额 8348 亿元。

^④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辑出版，1983 年第一期总 159 期

少，鹿、兔产量大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从1979年起，国务院先后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重申了三类产品和完成派购任务后的二类产品可以自由上市。1980年又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征购、派购，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除棉花外)都可以自由运销。此外，还规定基层公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以及提倡厂店挂钩、队店挂钩、产销直接见面等等。^①在这些改革措施下，生产自销、贸易货栈、各种联营商店、小商品批发市场、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多种经营形式相继出现，城乡私营商业资本迅速成长。国营商业则不同，以上三种职能都具备，改革以前商品经营统一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国家对城市商品流通体制也进行了“三多一少”^②的改革，为多渠道地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的“简政放权”将绝大部分国有批发企业、储运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92年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扩大经营范围、放开商品价格，增加商业经营品种。随后伴随国有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商业企业“租壳卖瓢”、“国有民营”，最后实现产权改革，成为完全面向市场的商业资本。

再次，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信用制度一方面必须以货币为基础，另一方面以社会生产资料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信用制度“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③信用能从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生产，激化基本矛盾。^④信用制度包括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等几部分。“一五”时期，我国取消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银行之间也不能相互拆

^① 胡永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的出现. 紫光阁杂志, 2008

^② 即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建立城乡互相开放的流通体制

^③ 资本论三卷，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④ 孙亚忠. 生产过剩形成的一般机理和我国的特殊机理. 生产力研究, 2002 (3)

借，此后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思想指导下，消灭了国家信用。文革时期，对商业流动资金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贷款主要用于企业流动资金，实行供给制，即“按进货计划或计划库存供应资金”；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贷款没有期限，进货就贷，销货就还，银行对企业资金使用没有约束作用^①。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既承担“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体系。1983年，取消了“存贷合一”，改为存贷分户管理，对超定额贷款实行逐笔核贷，定期收回。1985年全面实施“拨改贷”，标志银行信用制度基本建立。同时，银行还新增卖方信贷、信托、抵押贷款、银团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扩大贷款领域。在商业信用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商业信用提供土壤，自此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也在80年代建立并迅速发展，大量开展商业票据兑现、贴现业务。1983—1986年间，先后恢复并改进了票汇结算，开办商业汇票承兑和贴现业务。1986年推行了个体经济户和个人使用支票制度，开始建立同城票据交换所，扩大了票据交换范围。从1989年起，对银行结算制度全面改革，增强票据流通性，加速资金结算速度，建立了以票据为主体的信用结算制度。到1990年底，全国大中城市分行和绝大多数县支行建立了票据交换所，异地结算34%使用票据，同城结算94%使用票据。^②在国家信用方面，改革初期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不断增加，导致每年都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为此，从1981年起开始发行国库券，恢复了国家信用，并逐步建立与之配套的证券制度。此外，消费信用也随改革应运而生，1983年一些地区对高档耐用商品实行分期付款，银行也逐步开展了消费信贷业务。到90年代，与资本增殖相适应的信用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③

^① 周鑑郁. 试论商业流动资金信贷管理制度改革. 西南金融, 1983 (1)

^② 王伯岩. 银行会计改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当代经济科学, 1991, 57 (5)

^③ 奚君羊.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回顾及前景展望. 2000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80年代中期开始，财政分灶吃饭，“诸侯经济”形成。随着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基本矛盾就以中央—地方矛盾表现出来，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如汽车、机械、电子、烟酒等行业纷纷成为地方财政支柱。^①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几年，计划经济迅速瓦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步发展起来。在3年治理整顿期间，重复建设受到一定的遏制。南巡以后，出现资本主义大跃进，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审批权限逐层下放。从全国来看，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在90%以上。例如有22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27个地区生产电视机，有302家电视机厂，年产电视3000万台，市场需求2000万台，23个地区生产洗衣机，有89家洗衣机厂，19个地区生产电冰箱，有186家电冰箱厂；1995年全国轧钢企业达7363家，而冶金部系统仅有271个，其余都是各地自行决定的项目，平均每个地方21家、每个县3.4家。根据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我国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②在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有33种，主要是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的有35种，主要是轻工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轻工业品生产过剩主要是92年以后的“大跃进”造成的，92~94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7%、33%、57%；远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

^① 丁冰.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重工业领域主要是国外进口设备和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大幅增加，导致国内许多重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能力利用率降低。以发电设备为例，“八五”期间机械部安排生产 3000 万千瓦，进口发电设备却多达 4897 万千瓦，造成国内每年 500~600 万千瓦生产能力放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台订货合同也未接到；冶金部系统从德国引进 3 台套轧机，价格比国内制造高出 125%，使国内历时 8 年研制的技术设备闲置。^①到 1996 年末，全国 28 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 4 成以上处于闲置状态，如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25.5% 以下，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率仅为 3.5%。全国 3 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被长期闲置的就有 1/3。

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而短缺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数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是成功的。”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工商企业库存积压，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逐步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在 1996 年以前，我国社会总供给一直小于总需求。1984 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819 亿元，供需差率 11.4%，1994 年分别为 3275 亿元和 6.2%，1996 年上半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3391 亿元，供大于求 9.8%。1996 年下半年，在 609 种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 571 种，供不应求的 38 种产品中多数是农副产品。^③1997 年全国 600 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占 67%，供大于求的占 32%。1998 年生产设备大量闲置。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能力 54% 闲置，电子家电业中空调器生产能力闲置率达 67%，中小型电子计算机生产能力闲置 87%，化工行业中油漆生产能力闲置率 51%，轮胎外胎生产能力闲置率超过

^① 赵岷山. 我国某些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原因分析. 经济管理, 1997 (4)

^② 资本论三卷,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③ 王雅君. 当前中国结构性生产过剩的实证分析. 求是学刊, 1998 (1)

40%，纺织业生产能力高出市场需求 30%。1999 年对 605 种主要商品调查显示，供过于求达 437 种，比 1998 年下半年增加 38%，111 种农村土特产品中供过于求的 13 种，比 98 年下半年增加 18%，32 种农业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 20 种，比 98 年下半年增加 47%。^①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伴随着下岗、失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1981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288，1995 年为 0.388，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0.455。从 1981 到 1997 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 68%降低到 59%，消费需求不足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②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拉动“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从 1998-2001 年，中央政府累计发行特别建设国债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国内政府投资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

同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1999 年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 33 万家。在移动通讯领域，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手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1/3，其余部分分别为另外七家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程控交换机工业，七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程控交换机产量的 70% 以上。照相机 95% 以上由外商投资生产。复印机 98% 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③外国资本劳动生产率更高，取代本土企业后将进一步激化基本矛盾。

伴随中国加入 WTO，从 2003 年起，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以钢铁为例，2003 年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占 7%，利润占 22%，引发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高达 100% 年增长。2005 年投资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53%^④。在 2004 年的总投资中，65% 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 年一季度

^① 夏若江. 论我国出现的生产过剩. 社会科学动态, 2000 (9)

^② 网文, 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调查 (甘肃省兰州市)

^③ 钟华. 外资企业与中国生产能力过剩. 世界知识, 1999 (14)

^④ 王建. 生产过剩矛盾已开始酝酿. 瞭望新闻周刊, 2005 (27)

该比例上升为 71%。

机械设备制造业投资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建阶段，二是设备安装阶段。这两个阶段结束后，就会进入生产供给阶段。我国这一轮 2003—2005 年，土建阶段完成，2006—07 年，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阶段，08 年起大量生产能力投放运行。06 年开始进入投资收尾阶段，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回落（05 年前 5 个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 24%，06 年前 5 个月为 23.6%），并低于同期的投资增长率（05 年前 5 个月城镇投资增长率为 26.4%，06 年前 5 个月 30.3%）^①。在项目投资建设阶段，过剩状态就已经生产出来。据商务部发布的调研统计，2005 年全国 600 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 172 种，占 28.7%；供过于求商品 428 种，占 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②2006~2007 年，在 300 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 72.7%，供过于求的占 23%，供不应求的占 4.3%。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2006 年上半年，我国除石油、天然气两类产品外的 48 种主要产品全面过剩。商品房空置面积达 1.3 亿平方米，加上开发商明购暗存房屋总计达 1.5 亿平方米，一方面高房价、高空置，另一方面居民望房兴叹；汽车生产过剩 200 万辆，国内需求 600 万辆，实际生产能力 800 万辆，全国 2/3 省份把汽车当支柱产业抓，仍在发展；06 年煤炭总需求 21.7 亿吨，出口 0.8 亿吨，总供给 24.5 亿吨；05 年底钢铁生产能力 4.7 亿吨，实际需求 3.5 亿吨，2010 年生产能力将达 6 亿吨以上；05 年发电装机 7 亿千瓦，2020 年将达 10 亿千瓦，用电能力不超过 6 亿千瓦。^③

加入 WTO 以来，中国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基本矛盾也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分割。无论投资需求还是出口需求，都是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美国仍不断大量进口，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继续繁荣；美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必须依靠股市、房地产市

^① 赵雪芳. 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新变化与生产过剩. 中国金融, 2006 (15)

^② 开利综合观察. 中国产能过剩增添社会不稳定. 2005

^③ 霍明远. 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 论坛, 2007, 22 (1)

场拉动；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要想繁荣，就必须中、日等债权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同时全球利润仍流向美国；中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前提是中国仍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前提是中国出口仍然维持高速增长。在这个循环上，任意一环被打破，都将引起整个系统的动荡。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消费持续低迷，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开始下滑。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深刻，靠预支来世的消费能力来解决现世的生产过剩，沦落到只能依靠虚拟资产价格膨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随着美国金融泡沫的破灭，中国出口需求将大幅下降，以家电产品为例，2008年1~4月，主要产品对美国出口量下降，特别是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和电风扇这四种产品大幅下挫。以中美模式为标志的全球生产体系难以维系下去。

《宣言》讲：“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危机、股票行情暴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证明了这一预言。展望未来，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仍在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却开始萎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在中国以更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即“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能解决。

复活生息资本

生息资本主要有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银行业处于核心地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指出，银行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掌握大银行，并且要使银行“独享垄断权”。并指出：“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贷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指出银行由担任支付的简单中介人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出改造资本主义银行，“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产生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银行“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①，大银行是“我们社会主义必须的”国家机关，要把“银行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能使居民亲自进行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会计、计算和监督的国家机关网”^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金融服从于物质生产，毛泽东指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需要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银行是国家手中掌握的一种按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③

在毛时代，消灭了旧社会股票、债券、保险等生息资本形式，仅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存贷利息。从1953年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计划。对于长期资金和定额内流动资金，不计利息，由财政按照国家计划统一划拨，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对于工商业超定额流动资金，计利息，由银行贷放。银行不再是经济的核心，而仅承担簿记、会计、核算的职能。

^① 列宁全集三卷，第312页

^② 列宁全集三卷，第485页

^③ 陈晓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2004

<http://www.xucpa.net/Article/yxlw/jrlw/jrll/200701/20070124233008.html>

1978年，邓小平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二战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变通过计划配置资金的方式，开始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银行和信贷^①。1979年1月，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中国农业银行管理，重点“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1983年举办低利率开发性贷款，主要贷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专业队、专业组和专业户，以及从事副业综合服务的经济联合体，1984年后主要向乡镇企业、农村专业户、承包户倾斜^②，为农村私营经济获取初始资本提供便利条件。继恢复农行之后，1979年3月，改革中国银行，成为外汇专业银行，并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1983年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控制信贷总量、调节金融机构资金，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会计、计算和监督”的行政机关角色发生变化，以贷款业务为基础的生息资本体系逐步建立，并初步确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1983年，国营企业定额内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从1985年起，为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精神，全面推行“拨改贷”，国家财政预算内以贷款方式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一方面恢复生息资本，瓦解计划经济全国资本统一积累、通过财政无偿供应资金的方式；另一方面使银行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掌握国企债权，为向传统工人进攻埋下伏笔。

在资产阶级眼中，“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③80

^① 李葆华（1978—198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中国金融，1979（9）

^② 胡燕龙。新中国金融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p251—262

^③ 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年代邓小平多次要求“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专业银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政策，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1987年核定“三率”^①、下放“六权”^②，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从1986年起，还建立了一批新兴商业银行，如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一些区域性商业银行^③，打破了专业分工和地域格局，其中交通银行以股份制形式组建，成为商业银行诞生的标志。至此，银行不再是计划经济下财政部的会计，而是独立经营的生息资本，重新成为支配工商业的“现代经济的核心”^④。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完成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1995年3月，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立法将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强化了其金融调控的能力。1998年，央行对分支机构进行重大调整，跨区域设置了九大分行和21个地方监管办，使货币政策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计划管理向借助市场工具的间接调控方式转变。2003年12月27日，经过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强化了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能，明确规定了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

^① 即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利润留成与增补信贷基金或保险周转金的比率。

^② 即业务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调配权、利率费率浮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权、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聘与奖惩权。

^③ 全国性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包括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已关闭）、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等。

^④ 邓小平1991年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社会的总产品在分配之前要预留出教育、医疗等公共基金，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和用于退休人员、失去劳动能力人员的消费基金。^①在职能资本积累全国以后，这些社会保险基金统一从国家财政中支出。这样在毛时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保险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从1953年起保险业国内业务逐渐停办，中国人保仍然存在，仅保留国外业务。1979年4月国务院转批《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决定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设立保险公司。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运输工具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农村各类财产保险和养殖保险、人身保险等业务纷纷开展起来。1993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了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分离，改组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辖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3家子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改制为独立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陆续批准设立了大众、天安、华泰、永安、华安、泰康、新华等一批新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以榨取社会财富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保险业繁荣起来。

证券市场也逐步恢复。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1986年9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1990年末，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证券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到1994年底，专业证券公司已达91家。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长，1999年共有上市公司949家，2007年增加到1550家；投资者开户数1999年4810万户，2007年增加至13887万户；截至2007年底，上市公司市值达32.7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投机也随之兴起，进行投机的商人“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股票等形式的证券，其“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

^① 马恩选集三卷，哥达纲领批判。

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①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融资领域不断扩大，生息资本形式越来越多。198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作出决定：企业及企业主管部门的多余资金，可以委托银行对指定地区和企业投资或贷款，也可以委托银行代选对象进行投资或贷款。此后，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发展，到1981年末全国共有各种信托投资机构600多家。1981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与北京机电设备公司、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共同创建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后又与国家物资局等单位合建了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开始通过融资租赁吸引外资项目。^②典当也死灰复燃，并日趋活跃，1987年11月湖南省邵阳市永泰昌当铺复业，到1988年10月底，全国21个省份设立168家典当机构，其中浙江温州市典当商行就达42家。

适应生息资本发展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逐步形成。从1984年开始，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综合监管。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我国金融业开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1998年，证券委员会与证监会合并为中国证监会。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统一监管保险市场。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对外挂牌，履行银行业监管职责，中国金融管理“一行三会”的格局形成。

对外开放是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生息资本的复活和繁荣不是孤立的。早在1979年，金融开放就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金融机构陆续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营业性分支机构。加入WTO以后，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入股中资银行的步伐加快。目前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建设银行在内的国内多家银行都已经被外资参股或控股。中国金融集团已经同美英等国金融资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帝国主义时代，“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

① 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② 奚君羊.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回顾及前景展望. 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在原有人民银行基础上复活生息资本，对于资本培育意义重大。首先，生息资本的运动对利润率平均化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其次，加快了流通速度，加速资本积累；再次，无论是早期的人民银行，还是现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生息资本从全社会积聚闲散资本，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短短 30 年时间，中国就成为全球体系中的“世界工厂”。

同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作用一样，生息资本对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①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必然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支配所有资本家的货币资本，以及国内大部分生产资料。^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③

^① 资本论三卷，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② 列选三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③ 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附录：我们的学习方式

理论学习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当坚持的重要任务。学习基本原理，目的是用以指导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读原著，不是寻章摘句、用死人来吓唬活人，而是结合实践调查，应用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实践是盲目的；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和开展正确的工作。共产主义事业需要千千万万懂理论、重实践的同志去推动，当前这样的同志太少，因此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

从2006年夏至今，我们的小组学习已经坚持了两年多时间。每两周一次，每次分上午、下午两个单位时间进行学习，学习时事先确定主讲人。如果遇到好的报告或讲座，也穿插到学习计划中来。学习之后，大家都深感收获很大，认为有必要推广这种理论学习方式。因此，在这里对我们的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一、理论学习的基本原则

理论学习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理论学习应当以学习原著为主要内容。首先，多读原著，学习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在工作中不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其次，歪曲马克思主义是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的常用手段。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青年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错误观点，指出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文革中，针对陈伯达的“天才语录”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当前社会处于一个新的思想解放时期，但泥沙俱下，各类机会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掺杂其中，不少打着马列、甚至毛旗号的人都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贩卖私货。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认真阅读原著，以便“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

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第二，理论联系现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学习理论，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装点门面，也不是为了学知识而学习，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魏老教导我们“苦读马列，深入工农”，要结合实践调查，结合现实中与工农有关的问题，结合当前形势的需要进行学习和研究。

第三，积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小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汇、理论观点很容易，但掌握马克思主义很难。小组中大部分成员都是小资，从我们的亲身经历讲，左转很容易，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难。很多人左转之初非常喜欢马克思的语言方式，仅将其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经过一段时期就会消沉，因为发现现实太严酷了，自己改变不了什么，还是各奔前程、独善其身去了。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重点在于通过现实调查和理论学习，认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将自身同共产主义事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中，很容易看到一些工人的缺点，如何分析这些缺点，如何找到前进的希望，不系统学习理论、不深入思考是解决不了的。

二、学习小组的优势

毛主席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明确指出，“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同个人自由研究相比，小组学习的最大优势就是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个人读书时，受到个体经历、读书积累程度的影响，往往有很多地方读不懂，尤其是马列的著作，国外历史背景非常丰富，不了解一定的历史知识，就不容易理解。而小组学习则可以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使每个成员能更快的理解原著。

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我们的小组中，知识背景差别很大，既有马列专业科班出身的人，也有没上过大学的人。但在我们小组中没有理论权威，每个人都不能只讲或只听，小组学习是大家改造世界观过程中的重要集体活动，任何人都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阅读原著和参加讨论。学习中，按照学习计划进行分工，每个成员定期讲解一定的篇目或热点内容。这种方式使大家能够

共同进步。对于不善言谈的初学者掌握基本原理、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很多同志在以往学习中，很容易把自己置于“看客”的位置上，听听别人说说新鲜事而已，没有把自己看作学习的主体。在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小组成员与主讲人都是学习的主体，都要参与到读书、讨论中来。这对提高每一个人的口头表达能力很有帮助。在具体的学习方式上，强调多动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通过记笔记，并反复整理记录，对加强逻辑思路的梳理、增强辩证思考能力有很大帮助。

三、我们的学习过程

从2006年夏到2007年上半年，我们先按照《原著导读》学习了基本篇目。按照顺序，包括以下原著：（1）共产党宣言；（2）哥达纲领批判；（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5）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6）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7）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8）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9）国家与革命；（10）法兰西内战。此后，我们啃了几篇比较难啃的著作，包括：（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2）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3）怎么办；（4）反杜林论。针对大家哲学基础不足的情况，从2007年秋季到2008年年初，我们通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训练和准备，从2008年春节后，我们开始加大学习力度，同时学习《资本论》和改革开放史。学习的任务量较大，往往一天活动，上午读一两百页原著，下午再学一本历史书或一份历史资料，小组成员相互监督、相互鼓励，付出很大努力。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内容都按照计划完成学习任务。学习过程如下：

	上午：资本论	下午：改革开放史
2008-3-16	一卷第二版跋+前四章	76~78年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
2008-3-30	第三、四篇（5-13章）	真理标准讨论
2008-4-13	第五、六篇（14-20章）	78-82年历史

		历史决议的形成
2008-4-27	第七篇（21-25 章）	农村改革过程
2008-5-11	二卷 序言+第一篇（1-6 章）	国企改制过程及股份制的实质
2008-5-25	第二篇前半（7-11 章）	藏独、疆独问题
2008-6-8	第二篇后半（12-17 章）	伤痕文学及 80 年代文化领域斗争
2008-6-22	第三篇（18-21 章）	80 年代反自由化及 89 事件
2008-7-6	三卷 序言+第一篇（1-7 章）	89 到南巡讲话
2008-7-20	第二篇（8-12 章）	私营业主产生历史、现状
2008-8-3	第三篇（13-15 章）	民族资产阶级相关问题
2008-8-17	第四篇（16-20 章）	科技发展状况 包括运十、计算机工业等
2008-8-31	第五篇前半（21-28 章）	国企工人现状：安源实录
2008-9-28	第五篇后半（29-36 章）	（社会见闻研讨）
2008-10-1 2	第六篇前半（37-41 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
2008-11-8	第六篇后半（42-47 章）	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
2008-11-2 3	第七篇（48-52 章）+增补	金融体制改革

四、改革开放史部分学习资料及成果

学习时提前一个月确定主讲人、编制学习材料和参考书目，提前两周印发学习材料，便于大家及时阅读。主讲人需要大量搜集文献、广泛阅读有关书籍，以此为基础疏理某一方面的历史脉络，抓住其中的关键线索，并经过学习讨论以后形成较为完整的思路。小组对学习之后的小结很重视，每次学习之后由主讲人或相关负责人整理学习小结和成果，做到每一次学习都有新的进步，并最终形成这本小册子。

选取学习材料需要重视右派的研究成果。不少左派都有从主观社会学出发，设定各种理念，以历史适应观念的缺点。但一些右派却能从现实的矛盾入手，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教材。

对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专题，图书馆、网上的资料非常多，仅把

小组主要学习材料和成果介绍如下。

1、76~78 年历史

主要目标：梳理 76~78 年历史过程，研究造反派、凡是派、老左派、改革派的构成和特点，分析其中的必然性。

学习材料：《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参考书目：《1976-1982 年中国当代史》

学习成果：学习小结《1976~78 年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2、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主要目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的相关概念；分析真理标准讨论的目的。

学习材料：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判》，《1978：真理标准大讨论（节选）》

参考书目：于光远《1978 我亲历过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3、78-82 年历史

主要目标：学习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研究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定位和对文革的评价。

学习材料：《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龚育之《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起草的回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

参考书目：《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学习成果：学习小结《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

4、农村改革过程

主要目标：了解 78—84 年农村改革进程及其后果；研究 90 年代以来农村状况、“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

学习材料：《中国农村改革》，金宝瑜《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韩丁《大逆转》中《解读改革：1986 年农村的变化》，李昌平《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5、国企改革过程及股份制的实质

主要目标：梳理国企改革历史进程，研究国企改革的前提和后果；研究股份制理论与现实。

学习材料：《20 年国有企业改革大事记》，《80 年代国企改革》综述材料，冯同庆《围绕工人阶级理论的争论与工人阶级状况》，智效和《关于股份制性质的讨论》，江龙海《国有制不是公有制》，《股份制是企业改革的“唯一选择”吗？》

参考书目：《国企改革二十年》，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学习成果：《资本的复兴》，《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6、藏独问题

主要目标：研究民族问题的本质；梳理民族问题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学习材料：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阴法唐《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邓力群《胡、万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帝国主义与西藏问题》，王力雄《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

参考书目：徐明旭《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阴法唐《解放西藏史》

学习成果：《社会主义与西藏问题》

7、80 年代文化领域斗争

主要目标：了解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过程；了解 80 年代左右派在文化领域的斗争，包括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清污运动等；弄清异化理论产生的历史，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学习材料：吴江《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王若水《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绩伟《我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典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的演变》，《经典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关系的历史界说》

参考书目：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学习成果：学习小结《清除精神污染及文化领域斗争始末》

8、80 年代反自由化及 89 事件

主要目标：在上一次学习的基础上，研究 80 年代的群众运动；分析自由化产生的历史根源；总结毛的群众观。

学习材料：水陆洲《邓小平晚年之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相关章节，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韩丁《一位在场者的报告》

参考书目：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学习成果：《80年代的群众运动》

9、89到南巡讲话

主要目标：了解89—92年期间上层的矛盾斗争，南巡讲话的历史背景。

学习材料：张海涛《江泽民论反和平演变（要点）》，《交锋》之《六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邓小平：“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老布什给邓的一封信》，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0、私营业主产生历史、现状

主要目标：研究私营经济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了解私营业主的阶级属性。

学习材料：《关于中国私营业主的情况》，《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徐庆全《私营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戴建中《中国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

参考书目：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学习成果：《再造资本家阶级》

11、民族资产阶级相关问题

主要目标：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

学习材料：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周恩来《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参考书目：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12、科技发展状况

主要目标：了解科技发展历史，分析包括运十、计算机工业等民族工业的历史命运。

学习材料：《中国基础产业(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几乎已经全军覆没》，《高粱在与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发言：改革开放和工业科技

的自主发展问题》，《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已相对落后》

参考书目：《中国工业报一振兴装备制造业系列评论》，《雄鹰折翼—运十飞机纪念专辑》

13、国企工人现状：安源实录

主要目标：了解国企工人的现状、思想意识、阶级觉悟。

学习材料：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与社会政治发展》

参考书目：于建嵘《安源实录》

学习成果：《城市传统工人地位和作用》

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

主要目标：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了解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异同。

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斯威齐《市场经济非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参考书目：马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学习成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15、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

主要目标：了解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辨析社会主义的概念。

学习材料：明迪《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研究述评》，许金文《社会主义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过渡？》，贝特兰《苏联阶级斗争》序言

参考书目：贝特兰和斯威齐《论向社会主义过渡》

16、金融体制改革

主要目标：了解金融体制改革过程，理清生息资本重新产生的历史。

学习材料：《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分析》，《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李其庆《金融全球化的特点、起源和发展》

参考书目：《新中国金融史》，《新中国金融五十年》

学习成果：《复活生息资本》